

# 讀書通訊

第一二二期

## 學術論著

理想的大學與理想的大學生……………杜佐周  
論目前學術研究的危機……………檀仁梅

## 讀書★

★★指導  
記宋陳敷之農書……………唐慶增  
論研究商學的书……………李培恩

## 編輯講話

論文藝雜誌的編輯……………曹成修譯

## 學術論著

為什麼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竺可楨  
康熙帝與西洋文化……………潘楊公昭

## 名著解題

純粹理性批判……………劉燕谷

## 生活★

★★指導  
散步的藝術……………陳東林

## 學校通訊

山東政治學院的苦悶……………(李佐材)  
關於鄭縣扶輪中學……………(王任)

△車中望富士山(詩)……………胡適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 理想的大學與理想的大學生

杜佐周

我從事大學教育，至今已有一十餘年的歷史；積二十餘年的經驗，總覺得國內的大學，未能盡其應負的職能。就一般大學而言，不但研究與發明講不到；就是各種課程，亦未能樹立其相當的標準。長此下去，我們若要提高學術，建設文化，充實科學，復興民族，誠非易事！所以改良大學的品質，提高大學的程度，實為刻不容緩的要圖。

但如何去改良大學的品質，和提高大學的程度，那就不能不先懸擬一種目標，以為我們共同努力的根據。這個目標，我就稱為理想大學的完成。可是一個理想大學之能完成與否，每以其能否具備某種基本的條件為斷。依我所見，就是：

(一)優良的環境——環境如何，直接影響到人類的生活。山水秀麗的地方，不特令人心地開爽，且足助人思索；他若嘈雜污濁的區域，不特不宜於衛生，且復令人易於分心。大學既為研究學術的機關，自應隔離嘈雜污濁的區域，位置於風景幽靜的地方。庶幾居其中者，

得受優美環境的影響，增加學術研究的興趣。

(二)充實的設備——大學欲盡其研究的功能，除有優良的環境外，關於所必需的工具，尤須有適當的供給。如重要的圖書儀器等等，均是萬不可缺少的。假使一個大學不幸缺乏這種工具，則研究工作，就無從進行。如是，在名義上雖是一個大學，實際上不過是一個讀書的場所罷了。國內各大學的設備，能合理想的標準的甚少。這是我們急應注意而設法充實的。

(三)充裕的經費——上面講到設備一層，就非有充裕的經費不可。一個大學，若欲依照其所規定的計劃，切實履行其職務，經費實是一個先決的條件。經費若無把握，則一切計劃，不特無從實行，且亦無法預定。例如教職員的薪俸不能提高，兼課的惡習，就必無法制止。流弊所及，全校的研究風氣，將必大受其影響。

(四)真實專家的指導——這層是最要緊的。一個大學，若只有優

美的環境，充實的設備，和充裕的經費，而無真實專家去指導和鼓勵學生去做研究的工作，則仍難望有良好的成就。「有其教師，必有其學校」。一個理想的大學，必須有若干基本的教授，一方面自己埋頭從事於研究；另一方面積極負責訓練青年成為品學兼優而且富於研究精神的大學生。

(五)濃厚研究的風氣——具備優美環境，充實設備，與真實專家的大學或可說是已經備具理想大學的條件了。但是沒有濃厚研究的風氣，仍不能充分表現大學的功用。今後的大學，必須打破一般只知教書讀書，而不肯熱心從事研究的習慣。蓋處處表現研究的精神，多多發表研究的成績，才得稱為一個理想的大學。

(六)合理化與科學化的學校行政——以上五種條件，固是很重要的；但果能表現其功能與否，又視學校行政之是否合理及是否合於科學方法以為斷。倘若經費的支配失當，課程的編製不宜，人員的聘

用未能根據於事實的需要，則欲望其表現其功能仍難。故一個理想的大學，其行政之當求合理化與科學化，亦是不可容緩的。

一個大學若能備具上述各種條件，那可稱為一個理想的大學了。這樣的大學才能負起培植青年專家的責任。所謂青年專家者，就是我要說的理想的大學生。怎樣才算是理想的大學生？可分為二方面來說。先說第一方面，就是大學生應該備具的條件：

一、須有優秀的智慧——人類智力的高低，原有生成的。有的人只能接受小學教育；有的人能接受中學教育。要進大學從事研究，非有很優秀的智慧不可。所以大學的學生，應該經過嚴格選擇。不然，不特大學的標準無從提高，就是學生自己亦將無從獲益。結果，或將徒增許多不能勝任的煩悶而已。

二、須有充實的準備——大學的研究，是以中學課程為根基。若在中學的時期，隨便敷衍，普通科學目的基礎打不堅固，則到大學後，



這樣不知道，那樣不知道；在研究工作中，必將感到無窮的困難，且將無從進行。所以一個理想的大學生，必須有充實的普通學科的準備。

三、須有適當的擇學——個人的為學，固須根據於智力與準備；但興趣與志願等，亦是應當注意到的。我輩將欲從事於什麼研究，必須十分慎重選擇。若是對於所研究的科目，智力既能勝任，興趣又復相同，則學業上的進步必快，將來的成就亦必很有希望的。這層一年級的學生，尤當特別留心。

四、須有積極的努力——歷來大人物的成就，幾乎無不是從艱難困苦中努力得來的。凡是大努力的，就有大的成就；小努力的，就有小的成就；不努力的，就永遠沒有成就。這都是必然的道理，決不會有什麼例外的。研究學問，雖另一方面應有優美的智慧，充實的準備，和適當的擇學；但努力一層，實是更為重要。今欲為理想的大學生，當必積極努力於研究才好。

五、須有適當的工作分配——整天的遊玩休息，不事學術的研究固然不對；但整天坐在圖書館或實驗室裏做工夫，以致生活毫無調劑，亦是不當的。後者雖比前者為好；但有滿腹的學問，而無強健的體，亦將於世無補。所以理想的大學生，生活應有規則。什麼時候用功，什麼時候休息或運動，均宜有適當的分配。有適當工作分配的人

，不特生活可有調劑；即工作的效率，亦可因此而愈增加。

六、須有良好的性格修養——除了上述幾項以外，一個理想的大學生，還須有優美的人格。因為一個為學成功的人，若是沒有相當人格的修養，則誤用其學問而作自私自利的勾當，對於國家與社會，只有害處而沒有益處。如是，國家亦何必必要辦大學呢？所以人格的修養一層，更是理想大學生最重要的一個條件。

以上是說明理想大學生所應備具的基本條件，以下當再討論第二方面，就是理想大學生所應達到的目標。換一句話說，就是一個理想的大學生，到畢業的時候，應該有什麼成就。照我的意思，一個大學生的成就，至少須有以下數點：

一、應有廣博的知識——大學生所期待的，固然是專門的學問；但是專門的學問，必須建築在普通的知識之上。普通的知識，為專門學問的基礎；基礎不固，專門的學問，無從形成。即幸而有一點學問，亦是往往不合世用的。普通的知識，好比金字塔的底座，專門的學問好比金字塔的高峯。底座愈寬厚，高峯才得愈穩固。所以一個大學生，必須有廣博的知識，對於文學、哲學、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等，都要有相當的基礎。

二、應有專門的學問——大學的研究，既然是分門別類的，那末一個大學生從事四年研究之後，就

應該學有專長。任何學問，是研究不盡的。當然愈有精深的研究，愈好。好比金字塔的高峯，愈高愈足令人景仰。有些學生以為規定的學分讀足了，就可畢業，不必再事研究，這實在是很大的錯誤。他們不僅不懂得學問的道理，且未了解大學教育的真意義。

三、應有自學的精神——大學生接受專家的指導，經過積年的訓練，對於研究的工具，應該能够自由應用；對於研究的方法，也應該能够自己決定。原來為學之道，完全在乎自修。倘若我們沒有自學的精神，只憑平日教室內聽講和課本上的閱讀，得到一些膚淺的知識，就自欣幸以為學問，那就是十分可笑的笑話。

四、應有自治的能力——一個大學生，應該為自己的主人，能以理智來衡量一切。否則，就有廣博的知識，專門的學問，亦有何用？其實自律的行為，如不受一時情感的衝動，而能克勝自己，判別是非，及盡全力去維護「是」，而排斥「非」等，實比任何學問還要重要。一個大學生若這一層倘做不到，那麼大學教育，就完全失敗了。

五、最後，應有犧牲服務及推進文化的志願——這層也是很重要的，或且是最重要的。有的人說！我國的大學教育過於狂進；這當然僅指數量而言。其實，即僅就數量而言，亦是遠落人後。依照統計，我國一二萬人中，僅有一個大學生

；較諸他國數百人中就有一個大學生，相去要遠若干倍。由此可知我國大學生的責任，實更為重大了。他一方面應培養一種領袖的才能；另一方面尤須有犧牲服務的精神。我們到大學裏來，決不是僅求職業上的知能，或謀個人生活問題的解決；其最重要的使命，實在為社會服務。倘若畢業後，只知自私自利，希圖攫取公家利益以肥己，那就是大學教育中的罪人。

再者，大學生必須負起推進文化的責任。嚴格的說，這種責任，完全是在我們的肩背上。我們必須努力修進，做些對於文化有貢獻的工作，使本國的文化，於最短期內，成為現代化與科學化。當然，在現在，我們仍有充分容納西洋文化的必要，但亦必須使其成為本國化的必要，合於我國的需要。這就是說：理想的大學生要站在時代的前面，不應當開倒車；同時，不要一意的盲目去模倣西方，忘了我國自己社會的情態。

總之，一個理想的大學生，就應該備具他所應有的條件；同時，且當十分努力去完成他所應該達到的目標。我很誠懇的希望我國的大學，都能够逐漸成為理想的大學；而尤希望我國的大學生，都能成為理想的大學生。因為這樣，我們國家的前途，才得算是真正光明的。

# 論目前學術研究的危機

檀仁梅

一個國家的強弱，初看過去，似乎是以軍隊實力、經濟能力、與物質文明為量尺。當然國家應當注重海陸空實力的建設，沒有一國強國能夠不靠偉大海陸空實力的支持，而存在於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當然經濟能力薄弱，工商業不發達的國家，是沒有富強的希望的。當然國家若不能促進物質的文明，而徒靠祖宗的恩澤，是不能在廿世紀講物質文明的世界，與人並駕齊驅的。然而在這這些因素以外，還有一個因素，不特與國家的強弱有密切的關係，其實也可以說是其他因素的基礎，那就是學術研究了。這個因素在現階段的社會太被忽視了。其實軍隊的實力靠着學術研究，經濟發展靠着學術研究，物質文明更靠着學術研究。日本的海陸空軍不可謂不強，但在原子彈的威力之下，不得不屈服。原子彈的發明是多年學術研究的結果。美國經濟能力的雄厚，在戰時與平時的表现，引起舉世的尊敬與羨慕，但是這種經濟發展是靠着學術研究來支持的。最後，說到廿世紀的物質文明，若沒有學術研究做基礎，那裏能夠有今日的地步呢？所以要謀國家的富強，不可不注重學術研究。也可以說，一個國家的強弱，是以學術研究的程度為準尺。

學術研究既如此重要，我國現階段的學術研究情形如何呢？作者於過去五六年中在大學執教。大學本來是研究學術的最高學府，但是學術研究的空氣，淡薄得可憐。這不是某一個大學的特殊情形，而是各大學的一般情形。作者原以為這種現象只普遍於偏僻的角落，然而把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的海上，仔細加以觀察，學術研究的空氣，也未見得使人樂觀。上海的新書的確比內地多，上海的雜誌，有如雨後春筍，琳瑯滿目，似乎學術研究的成績不錯。然而翻起舊本與雜誌，要找學術性的著作與文章，雖不是鳳毛麟角，却也可說是並不很多。這是什麼原因呢？會寫學術性作品的人才本已無多，在目前的社會就是學術性的作品，也不見得受人歡迎，所以學術研究就很少人去注意了。這就造成了目前學術研究的危機。

上面已說過，一個國家的強弱，是以學術研究的程度為準尺。我國八年的抗戰，犧牲了無數的生命與金錢，受盡了辛酸與苦辣，所換來的就是一個建國的機會。現在在不平等條約已經取消，國際的地位已經提高，這是千載一時的建國良機。我們能否善用這個黃金似的機會，來建設一個富強

基本要素——學術研究——不可不三加注意。然而目前的學術研究，已經臨到最大的危機。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指出造成這個危機的原因並提出補救的辦法，以就正於關心學術研究的先進。

學術研究所以有目前的危機，最大的原因有三：（一）研究經費的奇絀，（二）青年心理的轉移，（三）社會風氣的冷淡。

先說研究經費問題。古語說得好，工夫要做得好，必需先有良好的工具。研究要能做得成功，必須有研究所需要的圖書、儀器、與材料。但是現在的文科研究，找不到圖書，理科研究找不到儀器。中國是一個窮國家。尤其在戰後，通貨膨脹，國庫收支不平衡，各機關要按月發給職員的生活費已是難能可貴，遑論到事業費呢！各機關情形如此，學術研究機關安能例外？結果，學術研究機關也只好量入為出，有經濟就做一點研究，沒有經濟就暫停研究。在這種經濟情形之下，研究工作無法進行的。

次說青年心理問題。學術研究需要一班視富貴如浮雲，棄功名如敝屣，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苦幹人才。我國並不缺乏這一種的青年。但是他們雖然能為求真理而奮勉工作，不慕功名，不貪富貴，而他們的最低生活總必須有保障，而後他們纔能安心工作。可是目前的物價高漲一日千里，而學術界人士待遇菲薄。他們為了從事學術工作，不曉得理財，不願意貪污，不兼營商業，結果開門七件事，件件無把握。作者有一個好友，是一個極努力學術研究的生物學家，可是他在大學所領的薪水不夠養活一家，最終險些鬧出離婚的慘劇。這種現象擺在青年眼前，青年的心理轉移了。他們看出學術界人士的苦痛，不敢嘗試了。他們寧可去國營機關當書記，銀行公司當職員，甚至街上拉黃包車，更容易解決生活的問題。因此根據作者在在大學裏與青年接觸的經驗，總覺得在目前要鼓起青年對於學術研究的興趣，可以說是千難萬難的。這種青年心理的轉移，對於學術研究缺乏興趣，是學術研究前途的一個致命傷。因為學術研究沒有人是無從做起的。目前的青年若不肯從事學術研究，還有誰去呢？這是一個嚴重問題。

最後說到社會風氣問題。現在的社會是充斥着不利學術研究的風氣。

記得做小孩時在私塾裏唸四書。唸到孟子去見梁惠王的一段，梁惠王的第  
 一句話是：「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的答覆是「亦  
 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當時的戰國與今日的中國，年代雖不同，而  
 社會背景却極相似。當時的人不講仁義，而單講功利。目前的中國社會也  
 是如此。大學裏的哲學系，歷史學系總是寥寥無幾，而經濟系沒有一校不  
 是有人滿之患。父兄送子弟入學，多不問他們的興趣如何，却指定他們要  
 選將來可以多賺錢的科系。一般的社會對於人的估價不是他的學術造詣若  
 何，而是他的房子如何，有汽車否，有財產否。總而言之，社會瀰漫着功  
 利的思想，那種不可以換麵包吃的學術研究，就不為社會所重視了。從事  
 學術研究的人士既不能求自己的溫飽，又不能得着社會的同情，當然難  
 免心灰意冷，這是社會風氣所迫成的現象。  
 學術研究危機的成因既然明白，現在有何補救的辦法呢？這不是什麼  
 人可以造得到，或是某一機關可以做得到的，而是要靠着政府當局，青年本  
 身與社會人士共同來努力，圖謀補救的。

第一在政府方面應增撥學術研究的經費。目前政府經濟的困難是事實。  
 但是我們若認定學術研究是建國的基本工作，那麼不論經濟怎樣困難都  
 要設法籌措。駢枝的機關可以裁撤，機關的冗員可以減少，一面即以節省  
 下來的經費充實研究機構。最低限度，要做到使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士得到  
 生活上的保障，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不至日日開門七件事，件  
 件都愁眉。這樣纔能使他們安心做學術研究的工作，為學術爭光，為社會  
 服務，為國家努力。這種經濟問題的解決責任在政府。希望政府在國家整個  
 預算內，對於學術研究費的增撥能够加以注意。

第二在青年方面，我們要認定學術研究是建國的基本工作。國家有出  
 路，個人纔有出路；學術有前途，國家纔有前途。在這個功利風氣瀰漫的  
 社會中，我們應當站住學術研究的崗位，來維持學術研究的命脈。我們相  
 信到了國家富強，社會安定的時候，學術研究一定逐漸受人重視。而危機  
 是在目前青黃不接，社會紛亂的時期，人心浮動，不想埋頭做學術研究的  
 工作。這時期若沒有少數人肯犧牲功名富貴來為中國的學術研究維持一線  
 命脈，那是國家社會的不幸。這種研究工作雖然似乎很苦，實在是極偉大  
 的世界的文明都建設在這些學術研究者的手上。沒有哥伯尼、沒有巴士得

、沒有達爾文、沒有愛迪生、我們能够有現在的文明嗎？所以我們不要自  
 暴自棄，不要以為學術研究是無益於己，無益於人的。我們中國若能產生  
 幾個哥伯尼、巴士得、達爾文、愛迪生等，我們的國家纔有希望。古語說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現在的中國學術界所需  
 要的就是少數的青年，能賦有一君子之德，站在學術的崗位，埋頭苦幹  
 ，做大多數青年的模範，使他們認識學術研究的重要，由認識而產生興趣  
 ，由興趣而實行研究。這樣，我國的學術就可以安然渡過目前的危機，並  
 且還可以有發揚光大的機會。

第三在社會方面應多予學術研究以鼓勵。報紙與雜誌應多刊載學術研  
 究的文章，多做提倡學術研究的義務宣傳。做父母的應當放大眼光，勸兒  
 女從事於他們感覺興趣的科門的研究，不可以功利為前提。社會教育的機  
 構對於學術產品的展覽應加以留意。各種專業團體對於學術研究的工作應  
 加以提倡、獎勵、與贊助。這樣在消極方面，可以逐漸減除功利思想的尖  
 銳化，在積極方面，可以轉移社會的風氣，俾對於學術研究，知所重視與  
 尊崇。

目前的學術研究遭着很大的危機，牠的原因已略加分析過，牠的補  
 救辦法，也略為提過。不過這種分析是否適當，這種補救辦法是否可行，  
 乃是一個問題。作者歷年躬身教育界尤其是大學，平時與青年及同人相接  
 觸相討論，都對於學術研究的危機極為關心。雖然學識有限，謹以一得之  
 愚，把這個重要問題提出，以就正於國內的學者，還祈予以指正為幸！

### 新書評介

編者

秉志先生著「生物學與民族復興」不日在中國文化服務出版，此書所述  
 約分三項：一、生物學發達之經過。於各銀子劃時代之貢獻，皆言之較  
 詳，可為生物學之發達史綱。二、十九世紀下半期，達爾文、赫胥黎、巴  
 斯德爾大家之學說出世，人類思想，為之不變。農林醫藥等學，皆因而猛  
 進。以生物學予人類一真正之人生觀。社會所受之裨益，至大且深，非  
 一般人所能見。三、生物學在近代之趨勢，在吾國內之發展，及國人對  
 此學應有之態度。以為促進科學，富國強種之基礎。全書議論警闢，文字  
 清晰，習此學者，可一目了然。未習此學者，亦易讀。既足感發興趣，文字  
 更可增長見聞，促進思想。凡欲悉此學與民族盛衰之關係者，不可不人手  
 一編。

# 記宋陳敷之農書

唐慶增

我國古籍中之經濟專著，大半係農業救荒財政等專書，尤以對於農業之書籍為獨多；據漢書藝文志所載，在該時農家著述，已有一百十四篇，惟泰半散佚。較晚所完成，流傳至今者亦不少，如賈思勰之齊民要術（後魏）陳敷之農書（宋），可農司之農桑輯要（元），徐光啓之農政全書（明），皆其著者。此類書籍，以現代科學眼光觀之，不免有膚淺疏陋之處，然其探討各種農事智識，一本於實際經驗；且因時制宜，皆以本國之需要為依歸，自有其特殊之價值。我人研究此類典籍，固可藉是獲得各種農業之智識，亦可窺見當時經濟狀況之一斑焉。

陳氏生平事蹟不詳，所撰之農書三卷，流傳甚廣，如晉賦、函海、知不足叢書，均收入之。（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內有之。）最通行者為綿州李調元氏校本。卷首有陳氏自序，先述我國歷代之農政，繼論宋代狀況，謂：

「承五代之弊，循唐虞之舊，追虞周之盛，列聖相繼，惟在務農桑，足衣食，此禮義之所以起，孝弟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然士大夫每以耕桑之事，為細民之業，孔門所不學，多忽焉而不復知，或知焉而不復論，或論焉而不復實！」按陳氏此言，確有見地，我國歷代政府於農業雖竭力提倡，然一般儒者，皆不肯切實講求，殊有背先哲重農之旨。氏在序中，復自佈其期望，謂：

「非苟知之，蓋嘗久蹈之，確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說以示人。」可見陳氏著該書之旨趣。至陳氏之貢獻，亦確能

達此境界。又序中以爲著述應「叙述先聖王仁民愛物之志，固非臆口空言，誇張盜名，如齊民要術四時要訣迂疎不適用之比也。實有補於來世云爾。」自屬著書應奉之信條，惟對於齊民要術四時要訣之評語，不免過甚其詞耳。

該書之次目如下：卷一，共十四篇：（一）財力之宜，（二）地勢之宜，（三）耕耨之宜，（四）天時之宜，（五）六種之宜，（六）居處之宜，（七）糞田之宜，（八）薊耘之宜，（九）節用之宜，（十）種功之宜，（十一）器用之宜，（十二）念慮之宜，（十三）所報之宜，（十四）善其根苗。卷二，共三篇：（一）牛說，（二）收養之宜，（三）醫治之宜。卷三，共六篇：（一）蠶說，（二）種桑之法，（三）收蠶之法，（四）育蠶之法，（五）用花採桑之法，（六）簇箔藏繭之法。材料之數量，雖不及齊民要術農政全書等之多，然於最重要之農業智識，大致亦具備矣。

陳氏以爲治田不在耕種畝數之多，當與其財力相稱，始有豐穰之望。故卷首財力之宜篇云：「凡從事於（疑漏去農字）務者，皆當量力而爲之，不可苟且，食多移得，以致終無成遂也！……儻或財不贍，力不給，而食多移得，未免苟簡減裂之患！……若深思熟計，改善其始，又善其中，終必有成遂之常矣，豈徒苟徇一時之幸哉！」氏續述古時之分田制，以：「深耕易耨而百穀用，」視爲最要之原則。財力既已具備，其次當審度地勢與天時二者，地勢有高下：「高地多寒，泉冽而土冷，……下地肥饒，易以滄浸，……

若高田視其地勢，高水所會歸之處，量其所用，而鑿爲陂塘，……其下地易以滄浸，必視其水勢衝突趨向之處，高大圩岸環繞之。……地勢之宜（此外氏復論及利用此二種土地之方法，叙述頗爲詳盡。至於一地之耕種，先後遲速，各不相同，旱田宜先，晚田宜遲；山川原隰多寒，則宜防寒泉之浸害。（耕耨之宜篇）天時之變化，由氣而感召萬物：「陰陽一有愆忒，則四序亂而不能生成萬物，寒暑一失代謝，則節候而差不能轉運一氣！……故農事必知天地時宜，則生之蓄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無不遂矣。……然則順天地時利之宜，諦陰陽消長之理，則百穀之成，斯可必矣。」（天時之宜篇）陳氏蓋以爲從事農業重在先知備豫，天道有常，須得法度時宜，則可矣。

陳氏謂種時之事，當「能知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六種之宜篇）每月有應種之植物，應得之收穫。正月種麻菜，五六月刈，二月種粟，七月可濟乏絕，三月種早麻，七八月可收，四月種荳，七月成熟，五月中旬後，種晚油麻，九月成熟，五月治地，七月加糞鋤轉，已（以）後種蘿蔔菜，七月治地，八月社前即可種麥，十月納禾稼黍稷，種種禾麻菽麥，無不畢有。（六種之宜篇）

墾種田地，在農場須有住所，古人認此爲治生之理，極爲重視；居處之宜篇，則論茲事，其結語謂：「民居去田近，則色利便，易以易事，」糞田之宜篇，專論肥料問題，以爲「土壤氣脈，其類不一，肥沃磷塊，美惡不同，治之各有宜也。……雖土壤異宜，顧治之如何耳；治得其宜，皆可成就。」書中又謂：「或謂土敵則草木不長，氣衰則生物不遂，凡田土種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說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時加新沃之土壤，以糞治之，則益精熟肥美，其力當常新壯矣，抑何敵何衰之有！」

由此可見陳氏認肥料之應用，可維持地力抵抗自然之限制也。薄耘之宜篇，論治草之道，建造溝澆之法，灌溉之術，蓋皆所謂耘田之法也。

該書重要之貢獻，不僅在農業技術之闡明，即在農業經濟原理方面，解釋亦精。譬如我國先哲，向主節儉，儉樸與農民生活，究竟有何關係？陳氏評論當時農民之經濟情形，謂：

「見小近而不慮久遠，一年豐稔，沛然自足，棄本逐末，侈費妄用，以快一日之適；其間有收刈甫畢，無以糊口者，其能給終歲之用乎？」（節用之宜篇）

此言農夫修者，不知儲蓄之重要也。儉固美德，然過儉則為吝嗇，非中庸之道，陳氏以為理想之生活，在折衷而稍偏向於儉，氏謂：

「儉雖若固陋，然不愈於奢而不孫為惡之大者耶？然以禮制事，而用之適中，俾奢不至過泰，儉不至過陋，不為苦節之凶，而得甘節之吉，是謂稱事之情而中理者也。」（節用之宜篇）

則發儉字之精義，頗中肯，近於荀子之說，古籍論節用之文字多矣，然能於奢侈之界限，予以辨明者，亦不多見也。

儉之意義如此，何謂勤？勤者，勞動之謂，政府當「藉功會事，以明賞罰。」（藉功之宜篇）陳氏復歷舉典籍內所載勤之議論，及國家賞罰之辦法，以為勸農乃國家第一要務，而農者尤當守其職責：「崇本抑末之道，要在明勤沮之方而已。況國家之於農，大則遣使，次則命官主管其事，然則在其位者，可不舉其職而任其責哉。（藉功之宜篇）念慮之宜篇則說明經營農業之不易

，平時當有準備，如能再致力於專一與精緻，則可累積無數細微之事務，而成鉅業，閒暇時間尤須利用，凡此諸端，與藉功之宜篇要點，可合而觀之。又論器用之宜一篇，亦諄諄以先時豫備，臨時濟用為言，亦重準備之意，古籍論農器，莫備於農政全書，所論多為陳氏農書所未及者，農書此節殊簡。

重農思想與神本觀念，極有關係，所報之宜一篇，論述者無非此旨。報者祈天之意，我國歷代於祀禮祀天典禮，極為隆重，以為茲舉可以禦大雷致豐穰。陳氏歷舉史實及詩文，以為說明，祈報不僅春秋社祀而已，譬如周禮有專官特掌祀典，非尋常祭祀之意義可比也。卷一之末篇，題曰善其根苗，以「種之以時，擇地得宜，用糞得理，……又從而勤，」為全篇主旨。

我國過去之農業著述，皆以畜牧智識為農業學識之一部，農書卷二，即專論此問題。氏以為自農業方面立論，牛之功較於馬，為耕種所不可少，非如馬必待富足，始可養治。氏論耕牛之功，謂：

「牧之於蒿萊之地，用之於田野之間，勤者尙或顧省之，惰者漫不加省，飢渴不之知也，寒暑不之避也，疫癘不之知也，因路不之恤也，豈知農者天下之大本，衣食財用之所從出，非牛無以成其事耶！」（牛說）其重視耕牛，可想見矣。

耕牛於農業方面，既有極大之功績，牧養之道：「必也在上之人，貴之重之，……愛之養之，……視牛之飢渴，猶己之飢渴，視牛之困苦羸瘠，猶己之困苦羸瘠，視牛之疫癘，若己之有疾

也，視牛之字育，若己之有子也；苟能如此，則牛必蕃盛滋多，奚患田疇之荒蕪，而衣食之不繼乎！」（牧養之宜篇）其次氏討論除穢飼養耕作調養諸端，因後世無萊牧之地，人類皆頑童，故講求牧養，遂避於前。該卷之末篇，醫治之宜，亦頗有見地，醫治牛病以審理適節為尚，尤當嚴防疫癘，免致傳染為患。

種桑育蠶之事，昔人亦視之為農事智識：宋時，秦觀，有蠶書一卷，殆為我國論蠶專著之最早者。在農書內，則列入末卷，此為全書精華之所在，以論種桑之法一篇，為最詳盡。陳氏將種桑手續，分作三段，源原本本，加以記述，例如論第一段，種樁子，當先將每枚剪去兩頭，存中間一截，以柴灰掩揉，留堅實者，土壤須經糞釀之手續，並加細沙，土地分若干畦，按時種四行，加以棚苗，長四五寸後，須將小枝葉剔除，並加以澆灌，此僅為第一段，第二三段，手續尤為繁複，種桑誠非易事也。下文並述種植海棠與杏之方法，均係經驗之談，非浮泛空論可比。

收蠶之法篇，所論亦甚精到，例如天時鋪蠶種用葉原蠶各問題，皆有論及。育蠶之法，研究自摘種與買種之不同，買種因擇蠶之早晚各異，故蛾出不齊，不若擇種之擇蠶，早晚齊齊，以後出苗食葉等事，皆可劃一也。用火採桑之法及簇箔藏蠶之法兩篇，亦屬陳氏心得，前篇於蠶之疾病，剖析彌精，後篇則敘述製造簇箔之方法及藏蠶應有之佈置。總之，此書可稱為早年論應用技術之鉅著，於經濟思想，亦多所闡明；著者之主張及著述體裁，與羅馬農業作家之貢獻，頗為近似，論我國往昔經濟專著，此書固屬極重要之一種也。



# 論\*文\*藝\*雜誌\*的\*編\*輯

中村武羅夫作  
曹成修譯

這雖是一篇著作，但作者是日本老牌文藝雜誌「新潮」的編者，「新潮」歷經日本文壇的滄桑，看者入家的興亡倏忽，而自己卻屹立不移，久而彌盛，則其編者對編輯方面的意見，自值得重視。承曹先生逐譯交本刊發表，願向讀者鄭重推薦。——編者

## 一、大量生產與特殊雜誌

經營任何新聞雜誌，都受資本的限制。離開了資本，任何新聞雜誌都辦不成。文藝雜誌在各種雜誌中，具有特殊性質。娛樂性質的雜誌和婦女雜誌，可以大量出版，獲得大量讀者，但文藝雜誌却不能大量出版。文藝雜誌，無論編得怎樣好，無論怎樣設法擴大勢力，讀者總是有限。據說日本的娛樂雜誌和婦女雜誌，有的每月竟銷到四十四五萬份，新年號最大銷到百二十萬份。以中國地域之大，人口之多，如果教育相當發達，不難銷到這個部數以上。

但是日本的文藝雜誌，其發行份數最大不過一萬五千部。純文藝雜誌從未得到兩萬以上的讀者。這在中國也是一樣。此事不關雜誌的好壞，編輯的巧妙不巧妙。純文藝雜誌的讀者，在任何時代都有一定。要銷到兩萬以上，十分困難。

因此文藝雜誌的編輯，一方面可以說容易，同時也可以說難。容易之處，是不像其他娛樂雜誌一樣，爲了爭取廣大的讀者，必須激烈競爭。娛樂雜誌和婦女雜誌，爲了爭取大眾讀者，寫一篇文章，拉一篇稿子，也得苦心積慮，絞盡腦汁

，其他如何抓住一個題目，登載怎樣的長篇小說，封面畫如何設計，如送甚應附錄等，莫不需要最大的努力。否則一有疏忽，爲了一篇文字，一張封面，也會給其他雜誌搶去讀者。

文藝雜誌在這一點上，置身於激烈競爭之外，不能不說是舒服。但這並不是說文藝雜誌的編者不必努力。他也要努力，不過不必像娛樂雜誌那樣從事激烈的競爭罷了。

娛樂雜誌和婦女雜誌既以大量生產，爭取廣大讀者爲目的，必須有相當大的資本爲後盾，才能盡其發揮技巧，爲所欲爲。但文藝雜誌則因發行數少，大抵虧本，因此在經濟上要受種種束縛。即使有種種好計畫，因資本不足，不易實行。一方面文藝雜誌的讀者，知識程度都相當高，各具一家的見識，僅僅施以一點編輯技巧，不見得能多爭取幾個讀者。

總之文藝雜誌的編輯，最感困難的，莫過於資本的束縛。名家的稿子，非拉來點綴不可。而有些名家，非千字多少稿費不肯寫，編者也不好意思請他寫。但稿費過大，對於文藝雜誌是一個很大的負擔。銷路好的娛樂雜誌，稿費大一點，無關痛癢，但在文藝雜誌却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能銷一萬份的雜誌，假定要二千元編輯費，則一冊就要二角。能銷五十萬份的雜誌，則只要四釐，兩者相差很遠。

以廣大讀者爲對象的娛樂雜誌，和銷數不能超過兩萬份的特殊雜誌之間，性質既如此不同，因此編輯方法，也自有差別。文藝雜誌不能不說是特殊雜誌中的特殊雜誌。

## 二、兩種編輯方法

編輯一本雜誌，編者不應把自己個人的意見和主張露骨地表現在雜誌上。編特殊雜誌時，固有編者自己站在表面，主張自己的意見。但多數編者都隱藏在背後，不站在表面。主編人的經驗與主張，即編者的個性，通過編輯工作表現在雜誌上，這是自然的，但通常編者都不直接站在表面。這一點在純文藝雜誌上是如此，在綜合雜誌也是如此。

因此編雜誌的根本方針，大體可分爲三類；一爲編者的個性盡量直接鮮明地表現在雜誌上，二爲編者的個性盡量埋沒在雜誌的組織中，而徹底發揮雜誌本身的特長，第三種方法居兩者的中間。

第一種方法只限於雜誌爲特殊目的而發行的時候。此際站在表面的編者，必須是社會上相當有名望的人物，或者是爲某種問題而爲許多人所關心的人物，否則沒有意義。總之重心與其說是在雜誌本身，不如說是在編者。

第二種方法是將重心放在雜誌本身上。編者和雜誌的精神融合一致，作爲雜誌的手足而工作。這樣編輯的結果，讀者但知其某雜誌，而不知



道編者為難，其主張如何。總之編者的姓名，人物不露現在表面，只見雜誌本身的鮮明的存在。最後一種，主編者雖不露骨地表面在外面，但他的個性却鮮明地反映在雜誌上，統一着整個雜誌。

第一種作為發表某一個人學說、思想、意見、或作品的機器的雜誌，現在姑且不論，編雜誌的方法，可分做兩種，一種是埋沒編者個人個性的方法，一種是根據主編者的個性，統一整個雜誌，使它具有一種特色的方法。

文藝雜誌的編輯，固然可以有這兩種方法，但普通都表現着編者的個性。娛樂雜誌以外的綜合雜誌，也大都表現着編者的個性。

### 三、介紹文藝雜誌的「新潮」

日本的許多文藝雜誌中，恐怕要算「新潮」的壽命最長，其編輯方針，很值得我們參考。新潮在日本，雖負盛名，但單就雜誌本身，是無法生存的。它每個月要虧蝕千圓至二千圓，沒有一個月能够收支相抵。它所以能延長壽命，有幾十年的歷史，完全靠發行人「新潮社」負擔它的虧蝕。

據生持新潮的編輯工作達二十年的中村武羅夫的話，在這二十年當中，從日本文壇上自然主義的鼎盛時期到新興藝術派的興起，可以說歷盡文壇上的滄桑。其間日本文壇上不知興起了多少主義與傾向，不知衰亡了多少流派與特徵。從最初的自然主義文學，繼之興起了以白樺派為中心的人道主義文學，其次盛行所謂遊蕩文學，或所謂享樂主義的文學，再其次傳統主義的文學，新技巧派的文學，無產階級文學，新感覺派，新興

藝術派等，相繼興亡。但在這走馬燈似的興亡史中，獨有雜誌「新潮」依舊巍然獨存，沒有跟着某一個主義，或某一個流派，雲消霧散。這要歸功於主編者的方針。

中村所主張的方針，就是雜誌不可偏於一派，它須為天下的「公器」。要雜誌不偏於一派，而常為天下之公器，編者決不可囿於「私情」，不可偏於編者的好惡。編者不可利用自己的地位，而將「公器」化為「私器」。他必須正確地認識文壇的大勢，儘可能公平地，客觀地加以批判，而將當時文壇的姿態最誠實地反映在雜誌上。

因此當時的文壇，如果自然主義文學盛行，則雜誌「新潮」中所反映的，自然以自然主義文學的創作和批評居多，人道主義文學盛行時，多反映人道主義文學，普羅文學盛行時，多採納普羅文學作品，新興藝術派文學盛行時，則多登載新興藝術派的作品。

「新潮」的編者在藝術觀上應該採取甚麼立

#### 車中望富士山 胡適之

一九三六年七月從神戶到東京火車中望見富士山口占

尋覓聖潔絕代姿，  
也能妖豔也能奇，  
忽然全被雲遮了，  
待到雲開是幾時，  
待到雲開是幾時！

場，或應該屬於甚麼流派，都不成為問題。他時時刻刻注意自己，告誡自己，不可為自己的藝術觀或自己的主義利用「新潮」這個大家的東西。他的職責是公正地反映時代的趨勢。

當然，有人反對這種方針，說編者見異思遷，沒有矜持，沒有貞操。但「新潮」的編者却認為「新潮」既是天下的公器，是大眾的東西，編者個人自然無所謂矜持，無所謂貞操。例如一個作家或批評家的立場，即使和編者私人的立場不同，但如果他們的主張是當時文壇的趨勢，則編者必須請他們撰稿，把他們的主張或作品發表在「新潮」上。編者個人無論怎樣不喜歡的稿子，無論怎樣不佩服的作品，也必須登載。在雜誌上登出之後，編者認為有反對的必要，儘管自己發表反對意見好了。把他人的作品登在你的雜誌上是一回事，你去批評，你去罵，又是一回事。不可把兩者混淆起來。

罵「新潮」沒有貞操的人，大抵是已經從那個時代的勢力落伍了的人。如果雜誌而有貞操，這種雜誌，即使能在一個時代繁榮，另一個時代就要滅亡。「新潮」果然在自然主義鼎盛時代發表過自然主義作家正宗白鳥的作品，但如果「新潮」一定要把正宗白鳥的作品登到他死為止，那麼「新潮」作為文藝雜誌的生命，恐怕不能延長到一年。大家的東西不能隨一個主義或一個作家而盛，不可隨一個主義或一個作家而亡。

辦雜誌，不可有甚麼矜持。必須十分敏感，十分大膽，昨天的東西今天可以拋棄，今天的東西明天可以拋棄，必須日日新，又日新。雜誌而有矜持，必成一池死水。這是必須銘記在心的。

# 爲什麼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

竺可楨

爲什麼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這個問題，近兩年來很引起人們的注意。不但國人有許多議論發表，即歐美人士亦注意到這個問題。各人的意見雖有不同，但歸納起來，大多數統以爲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並不是因爲中國人先天的沒有這種能力，而是由於我國歷史上環境不適宜的緣故。在科學與技術期刊上，陳立夫先生「我國科學不發達的心理分析」一文裏的結論是「中國科學之不發達，我會溯源於（一）攝人思想的泛生論，（二）沒有工具思想的直觀方法，（三）沒有邏輯，（四）沒有分工，（五）客觀與主觀的混淆，（六）理智的不誠實等等。但這一切都指出，係反映着客觀社會的組織。在宗法階段的社會，便祇有宗法社會的思想。」去年浙江大學夏令講習會，錢寶琮先生在「吾國自然科學不發達的原因」演說裏，有這樣幾句話：「我國歷史上亦曾提倡過科學，而科學所以不爲人重視者，實因中國人太重實用。如曆法之應用，早已發明。對於地圓之說，亦早知之。然因不再繼續研究其原理，以致自然科學不能繼續發展。而外國人注重實用之外，尙能繼續研究，由無用而至有用，故自然科學能大有發展。爲什麼我國民族太注重實用呢？實由地理、社會、文化環境使然。中國爲大陸文化，人多以農業爲主，祇希望能自給自足之經濟。」同樣中英科學合作館，英國李約瑟博士。在民三十三年湘滬舉行中國科學社成立三十週年紀念大會演講裏，亦以爲近世科學之不產生於中國，乃以圍於環境，即地理上、氣候上、經濟上、和社會上的四種阻力。地理方面中國爲大陸國，向來是閉關自守，固步自封，和西方希臘羅馬埃及之海洋文化不同。氣候方面，亦以爲大陸性甚強，所以水旱災患容易發生，不得有大规模灌溉制度；而官僚化封建勢力遂無以掃除。中國經濟，和社會方面，秦朝以來，官僚士大夫專政階段停留甚長，社會生產少有進展；造成商人階級的沒落。使中產階級人民無由抬頭，初期資本主義無由發展。而近世科學則與資本主義同時產生。抗戰前數年，德籍猶太人維特

福格爾K.A. Wittfogel在他的研究中國社會的著作中，有一段專講中國爲什麼沒有產生自然科學。他開始提出一個問題。他說：「半封建主義的歐洲，在經營規模並不大於中華帝國，甚至往往小於中華工業生產的基礎上，完成了許多的科學發明和貢獻。這一切顯然是表示了初期資本主義的各種特徵，狂熱地催促小資產階級在積蓄勢力的環境下所完成的。拉狄克曾經指出歐洲產業革命以前的西歐社會關係，和中國的這種關係有某種根本的差別。若不承認這種見解，則中國環境既和歐洲產業革命以前的環境一樣，那爲什麼不引起了科學的萌芽和科學的發展呢？」對於這個問題他的答案是：「除了歷史科學語言科學和哲學而外，中國只在天文學和數學方面得到了真正科學上的成就。而就整個情形看來，那和工業生產的形成有關的自然科學，不過停滯於蒐集經驗法則的水準罷了。……漢代或漢代以前的中國，爲什麼在數學上和天文學方面達到了較高的水準？假定這些科學的產生，是建築在各種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和水利工程上的社會秩序需要上；那末只有這個時代才是這些科學的成立時期吧？」接着他說：「中國思想家們的智力，並沒有用在那可以形成機械學體系的各種工業生產問題上面；並沒有把處理這些問題作爲根本的緊急任務。這個遠東大國的根本智能，集中到了其他的課題；即農業秩序所產生的，及直接和農業秩序有關的，或在觀念上反映着農業秩序的各種課題。」他的結論是：「他們在這裏還不能夠從亞細亞社會和歐洲社會的關聯中，檢討亞細亞社會爲什麼不能以解體過程中的歐洲中世紀的半封建主義那樣的方法和程度，去推進大规模的工業經營。我們僅僅確認這個事實：即是精密的自然科學的停滯，是和這種工業上的停滯互相平行的。……中國自然科學各部門所以只有貧弱的發達，並非由於偶然；而是那些妨礙自然科學發達的障礙所必然造成的結果。」

上述四位作者對於本問題的結論，統歸根到中國舊社會之不適宜於產

生自然科學。錢寶琮、李約瑟和維特福格爾三位先生一致主張是農業社會的制度在作梗；陳立夫先生的意見是由於宗法社會的組織。兩者的意見實是二而一。因為宗法社會只有以農業為經濟核心時才能維持，才能發展。據京都大學教授森谷克己的意見，宗法社會的功能是：（一）祭祀祖宗，（二）逢年逢節時合族的聚餐，（三）親族的喪服，（四）同宗不婚的習慣，而最重要的是（五）他的經濟功能，——即古時所謂「兄弟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於宗，不足則資於宗，」一族內財產之有無相通辦法。森谷克己又說：「在中國原始的姓之社會的諸職能，在宗法下是很多保存着的。在這裏就出現了中國社會進化之一特性。」農民安土重遷，可以利鄰縣鄰村的人老死不相往來，所以容易保持宗法社會制度。到了工商業逐漸發達，天下之大，隨處可為家庭，宗法社會的制度，即無以維持。呂氏春秋尙農篇對於這點說得很透澈。「民農則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德。」人民到皆有遠志無有居德的時候，宗法社會決難維持了。

我國若承認了中國古代自然科學之所以不發達，是由於中國社會農業勢力之偉大，和工商業之不發達；接着就發生第二個問題：為什麼在中國歷史上農業社會能保持這種壓倒的勢力如此之久？英國拉斯基教授說：「政治哲學必須以歷史哲學為基礎。歷史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興衰存亡，治史者各有各的觀點。類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或者以為出於天命，或一種不可阻抑的勢力，如黑格爾即作如此觀；或者以為由於天氣之變動，如熱帶宜於獨裁，溫帶宜於民主；亦有把歷史當作幾個偉大人物的成功或失敗事業史觀者。……但是經濟生產方法的改進，最足以左右一切歷史上的變動。」拉斯基又說：「歷史上變動最快的時代，亦即是經濟生產方法變動最大的時代；歷史上穩定的時代，亦即是經濟生產方法比較固定的時代。」他而且舉了文藝復興，產業革命，和二十世紀初葉幾個時期作為歐洲生產方法變動最大時期，亦是思想最燦爛時期。我們從經濟生產的觀點來研究歐洲近世科學之興起，方能了解十六七世紀歐洲科學之進步，決非偶然之事。一般人以為近世科學起源於伽利略、牛頓幾個偉大傑出人才，實是大誤。自從一五四二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西歐工商業大為活

躍。海洋中船隻駕駛，需要專門工程智識；貿易繁盛，金幣不足應付，鑛冶迅速發展，而開鑛時又發生許多問題，急待解決。在十五世紀末，歐洲已有了十六種機器為鑛中去水的用途。航行發達，望遠鏡與羅盤針之製造日趨於精密。經緯之測定，又要天文智識。到一六六〇年左右，英國有一班學者，專門為了好奇心所驅使，來集會討論研究一切事物，自宇宙以迄蟲魚，這就是英國皇家學會的起頭。英國皇家學會之所以成立於十七世紀中葉，亦非偶然之事。因當時富商巨賈之特興，造成了一個有閒階級，時常往來旅行。他們的目的並不是孳孳為利，而是為了求知心所驅使。這實在是近世科學之開端。

我們瞭解了近代科學和社會進化的關係，再來看我國歷史上是否有一個時代可以獎勵工商業的發達，初期資本主義的興起，使中產階級能起而與專制封建勢力相抗衡，如同十六七世紀歐洲新興勢力之與封建宗教相奮鬥呢？歷覽二三千年的我國歷史，只有在戰國到西漢中葉一個時期有此可能性；而這個時期亦是中國思想史科學史上最燦爛的一個時期。馬乘風中國經濟史裏說道：「因為戰國時代之經濟發展，所以隨之以政治組織和意識形態亦均活躍異常。在中國文化史上來看，除了近代歐化勢力東漸以外，幾乎找不出一個時代，能够與戰國之百家怒鳴萬壑奔流相比。」張蔭麟中國史綱中亦說：「自從春秋以來，交通日漸發達，商業日漸進步，商人階級在社會日佔勢力。儒家法家雖統主張加以嚴厲裁制，——但漢代統一中國後，一方面廢除關口和橋樑通過稅，一方面開放山澤，聽人民墾殖，給工商業以發展的機會。此時牛耕逐漸推行，加以政府的放任，蓬勃之氣象，為此後直至海通以前，我國工商界沒有超出過的。」在漢代文景二帝時候，商人的勢力最大，當時富商往往也是大地主，專川澤之利，管山川之饒，他們的生活，據鼂錯說：「衣必文繡，食必梁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游，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繼文景而君臨帝國的漢武是一位好大喜功的人，自從他即位後二年，即派張騫去西域。從建元六年到元狩元年，十六年間，專力排擊匈奴，計九次出塞，所斬獲人數在十五萬人以上，把河西走廊改設武威酒泉二郡。從元狩四年到太初五年，十七年中，又把南越朝鮮西南夷收為郡縣。漢武開拓疆域，論時間與範圍統是空前的。與西歐相比，這正如哥倫布發現

大陸，開闢了廣大殖民地，使工商業大可發展。據張蔭麟云：「張蔭麟使西域以後，各國繼續聘請為那國英彙或市井無賴開了新的出路。」照理論講，文景之世商人勢力既如此龐大，而後漢武又開拓疆域，使工商業更有用武之地，那末初期資本主義就應該產生，而近代科學亦應該見萌芽了。但歷史告訴我們，事實並不如此。這其原因又何在呢？

地理的環境是有關係的，若是西域不是一片荒漠，而是一片沃土，如歐洲的烏克蘭或是茫茫大海如大西洋，那大概我們歷史上的發展就要大不相同。但這種推想，不能解決目前所討論的問題。灌溉的制度，和君主專制政權之確立，是平行不背的；但不是樹立君主專制政權重要的因素。從戰國時代魏西門豹鑿十二渠，韓鄭國為秦鑿涇水渠，蜀李冰等築灌縣水渠，直到漢武帝在縣中鑿六渠，這期間水利的事業的確大有發展。黑格爾、恩格斯、馬克斯和馬札爾輩主張水利工事的統制，建立了中國專制政權。李約瑟和維特福格爾亦多少抱這種見解。但建立秦漢專制政權的因素，決不祇此一端。馬乘風舉出（一）財政的管理及田賦的徵收，（二）常備軍之訓練和調動，（三）各地執行民法刑法的衙門，和（四）專門選拔為皇帝作愚民政策，為國家做辯護士的考試和選拔制度。這四者對於確立秦漢專制政權比灌溉水利事業更加有力量。

但究竟那一種勢力能最有效的建樹了帝王的政權，摧殘了商業的發展，毀滅了近代科學的萌芽呢？這我們不能不根據歷史上的事實。在春秋時代，商業尚未發達，當時帝王並不感覺到商人奪取政權的威脅，所以左傳有「務材順農，通商惠工」之說；國語有「輕財易道，通商寬農」之語。那時農工商尚不分厚薄高下。春秋時代經商的子貢，不失為孔子大弟子，太史公貨殖列傳稱：「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到了戰國，鐵器已普遍應用到農耕上；施肥的方法盛行，大規模的灌溉事業亦統建設起來；農業生產大大的增加，商業亦隨之以活躍。自越之計然秦之商鞅以後，重農抑商，以農為本商為末之議論勃興。漢代初期，工商業更有長足之進步。富商之衣食住，擬於王侯；收養豪傑，權傾人主。當時的知識階級如賈誼、董仲舒之流，就統主張嚴厲的裁抑商人。但是裁抑自裁抑，輿論自輿論，而文景之世，商業勢力仍然繼續增高。

所以是錯嘆息道：「法律賤商人，而商人已富貴矣。法律貴農人，而農人已貧賤矣。」漢武開拓疆土，本可使工商業繁榮；但是相反的，商業於漢武之世反形凋落。這是因為根據了重農抑商的政策。武帝厲行了三種制度，使商人統統於破產。第一是商人加算，與聽人告緡，始於元狩三年；明邱潛世史正綱卷四云「古者關市之征，蓋惡其專利，就征其稅，非穩度其所積之多少，而取之也。武帝於元光五年，既算其行者之車，至是又併算民車，且及紅焉；凡民不為吏不為三老騎士，苟有輕車，皆一算。商賈則倍之。紅五丈以上者出一算。匿而能告者以半界之。」匿而被告者稱告緡。自告緡令施行後，據說中產以上的商人，大抵破產。第二是商人不得名田；漢初富商大賈，亦多為大地主，或投資農村，如對宛氏之規陂池。商人不得名田，即不得置產業；使商賈與大地主絕緣，商業資本遂以偏枯。第三是將當時最大的私人企業，鹽和鐵收歸國營；這也是元狩三年的事，置鹽官凡二十八郡，鐵官凡四十郡，設有私鑄鐵器及鹽販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據史記貨殖傳秦漢之交的幾位大富翁，以職業而論，多為鑄冶者。我們把貨殖傳的幾個富翁，列舉起來。猗頓用鹽起家；猗縱以鑄冶與王者相埒富；巴蜀寡婦清傳丹穴，擅利數世，秦始皇為築懷清台；蜀卓氏用鑄冶富秦破趙，……至儻千人，田池財獵之樂擬於人君。此外以冶鐵致富者，尚有程鄭宛孔氏，曹邴氏。惟白圭以善觀時變，如今日之投機家，操縱市場。宣曲任氏以窖藏致富，乃今所謂囤積居奇。此外則齊師史以運輸致富，烏氏保以畜牧致富。假定司馬遷這統計可靠的話，那末以鹽鐵起家致富的，在當時富翁總數裏，十一個中要佔到七個。自鹽鐵歸為國有，這類財產就要被沒收了。從上面敘述之事實看來，自春秋到漢初三百年中，我國商業有欣欣向榮的趨勢，到漢代武帝國勢昌盛的時代，正應該繼續發展，以達到像西洋初期資本主義的階級，却為漢武帝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所打斷了。

從戰國到漢初，一方面是工商業發達時期，一方面亦是中國思想上最燦爛的一個時期。諸子百家各種學說，統在此時出現，好比西方紀元前六百年到二百年時代的希臘。戰國時代中國思想之所以突然解放，亦有其社會之背景。張蔭麟說道：「當封建時代的前期，貴族不獨享有政權和田土，並且專有智識。閱報和教育，是他們所獨享的。在封建制度演化中，貴



族的後裔，漸漸有降為平民的，知識遂滲入民間。」馬乘風亦說：「戰國時代以前，知識是貴族獨佔的，貴族與農奴處於絕對不同的生活狀態之下。到了戰國時代，因為階級關係的變動，昔日隸屬關係之羈絆，已被打破，所以平民求知就成為可能的事了。」因為求知之機會，由上層階級推廣至於中層，甚至於下層階級，思想就驟然解放，而突然發生異彩，一時學說並陳。但何以在這思想解放的時代，科學的思潮不能發展？對於宇宙的觀感，天然事物的剖析，中國趕不上希臘呢？對於這一點，張蔭麟先生亦有很好的解答，在論中西文化的差異這篇文章裏，他說道：「中西文化的一個根本差異，是中國人對實際的活動的興趣，遠在其對於純粹活動興趣之上。以亞理士多德的尼哥麥其亞倫理學和我國的大學中庸來比，是極感興趣的事。」亞理士多德認為至善的活動，是無所為而為的真理的觀玩。至善的生活，是無所為而為地觀玩真理的生活。大學所謂止於至善，則是為人君止於仁，無人臣止於敬，為人子至於孝，為人父至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這差別還不够明顯麼？中國人講好德如好色，而絕不說愛智，愛天。西方人說愛智愛天，而絕不說好德如好色。蔭麟先生所指出這中西文化在價值意識的差異，是極重要的一點，蔭麟先生很謙虛地說：「我不知道有什麼事實可以解釋這價值意識上的差異。」據作者的意見，以為這也是因為中國社會一直以農業為核心的關係。希臘社會曾經經過游牧時代。她是一個半島，沿岸布滿了無數的小島，所濱的海是內海，而非大洋，和海外來往是很便利的，所以商業從頭即易於發達。我們是一個大陸國家，長江以北沿岸極少島嶼，二入茫茫大海，就毫無歸宿。從殷墟時候起，即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生產。中國有史以來，並不知用乳酪。天上星宿，只有龍、鳳、牛、龜，而沒有畜牧時代主要的產業，山羊或綿羊。中國古代是否經過一個畜牧時代是疑問。即使經過亦必年代很久遠，或是時間很短促。從殷商到漢初，經過至少一千二百年以農業經濟為核心的社會，其束縛人民的思想，習慣，個性的勢力自然非常雄厚。以農業為中心的社會，他人個性的好處是誠樸、穩重、和平和堅忍；他的缺點是愚昧、自私、乏冒險心和不能合作。到如今，我們民族還仍然反映這種優點和缺點。呂氏春秋尚農篇云：「古先聖王之所以理其民者，先務於農；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

，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私法立，力專一。……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古代帝王就利用這理論來提倡重農抑商。農業社會勢力大，求知之心不能發達，而科學思想亦無以發展。

照上面所講，希臘古代求知之精神既如此充足，為何希臘亦只能發達科學到一定階段，而近世科學亦終不能實現呢？這其中重要因素，是由於奴隸制度盛行於希臘。所以古代希臘一班哲人，如發明幾何學之畢達果拉，主張原子論之德摩克萊斯以及蘇格拉底、柏拉圖輩，雖有閒暇以沉思其高尚之理想，而不願胼手胝足以作實驗。而近世科學，非手腦並用不行。英國拉偉教授說：「有閒階級思想上之努力，可以得到理論上之發展；但有閒階級不願動手。奴隸階級可以作實際之工作，但不敢獎勵使之瞭解高深之理論，埃及希臘羅馬之所以對科學上機械上供獻之有限度者，正以此數國社會上有階層之結構。」故據偉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之意見，生產勞動者不具有公民資格。希臘社會組織為有階層的。希臘人之奴隸，即希臘人之機器，只需奴隸之代價便宜，即不需另覓代替品。反觀我國情形，亦和希臘相似。孟子謂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士大夫階級是勞心者，而農民苦力是勞力者。這樣階層結構，迄今還存在。長衫階級以及學農學工的大學生，仍認動手做工為可恥。這種觀念不改變，中國自然科學亦難望其發達。

歸根起來講，中國農村社會的機構和封建思想，使中國古代不能產生自然科學。而此種機構，此種思想，到如今還大部遺留着。人民一受教育，就以士大夫階級自居，不肯再動手。在學校所習科目，只問其出路之好，待遇之豐，更不較量科目之基本訓練如何，個人之興趣如何。把利害之價值，放在是非價值之上。而社會上一般提倡科學的人們，亦只求科學之應用。怪不得維特福格爾說：「在現在日益走向解體過程中的中國，上層階級和最高官廳，也對於自然科學發生興趣，加以獎勵，但他們所懷抱的意義，和西洋完全不同，這是千萬萬確的事，誰也不能否認。」據容闈所著西學東漸記，謂同治六年，曾文正公方初定搶匪回到上海，去赴南京兩江總督任，極注意於其親自手創之江南製造廠。文正見之，大為歡喜。容闈因勸其設立兵工學校，以期中國將來不必需用外國機器，及外國工程師，大為文正所贊許。從曾文正到現在，我們提倡科學已近八十年，而仍有人主張西學為用中學為體或類似的謬論。希望原子彈之發現，能打破這般人的迷夢，而使中國科學入於光明燦爛的境界。

# 康熙帝與西洋文化(續)

楊衛玉  
潘公昭

## 內容提要

1. 康熙帝和路易十四的關係
2. 康熙帝的數學研究工作
3. 康熙帝的醫學研究工作
4. 康熙帝與近代人文科學
5. 康熙帝與天主教解禁
6. 東西兩位大帝的野心與興趣
7. 路易大帝的失敗和康熙帝的成功

## 四 康熙帝與近代人文科學

康熙帝不單跟法國傳教師學習西洋的自然科學，並且攻習西歐的人文科學。因為學習了數字研究法之後，他採用同樣的方法，向白進和張誠兩位大師學習西洋哲學，用滿洲文編纂哲學教科書。兩位大師又向這位中國皇帝講授西洋哲學，為使理解其真實的意義，認為引導這位「天子」改宗，實為第一要著，所以曾經盡其九牛二虎之力，從事於哲學教育。在這種目的之下，他倆認為法國學士院會員杜亞曼 (Duhame) 所著的「古今哲學」(Philosophie ancienne et moderne) 最為適當，因此就用這部書做藍本而編纂哲學書，不過後來因為康熙帝御體不適，停止哲學的講學。後來，康熙帝對於基督教感到一種好奇心，很想研究一下這所謂「邪教」的內容。在向南懷仁氏聽講西洋哲學的時候，康熙帝已經多少了解一點天主教的教理。他翻讀過初期傳教師進獻於「天子」的幾部宗教書的漢譯本，其中特別是最先到中國來的耶穌會士利瑪竇氏編纂的「天主實義」等等，會放在他手邊大約有一年。而且，白進和張誠兩位大師在進講數學的時候，當然一碰到適當的機會，也就講些天主教的教理給皇帝聽。

中國政府因為楊光先和攘夷論者的煽動，於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公佈天主教禁令，(「信教奉褒」，上卷第六十一頁)，不過對於外國人之信教，仍允其自由。後來政府對於本國人的改宗，也實際表示默許。特別是康熙帝，對於外國學術宗教大師在宮中宣傳福音，也不認為違法行為。所以，他對於天主教將來在中國普遍宣揚，是毫無疑問的。隨侍君側的耶穌會士看到皇帝這種態度，非常欣慰。(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 t. III, p. 103) (Bouvet, Histoir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pp. 112-113) 富意大利耶穌會士殷特爾泰氏 (Intorcetta) 奉路易十四世的勅命而把「大學」「中庸」「論語」翻譯成拉丁文的時候，這個國王承認孔夫子的教義和天主教的教理實在是不謀而合的。(Intorcetta, Avis, p. XVIII, — R. Thevenot, 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 t. IV, Paris, 1629. — Bouvet, Histoir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pp. 146-174) 康熙帝亦因為讀過天主教教理的漢譯本，並且向身邊的西歐博學大師研究過異教，也認為東西兩教與自然之大法一致。所以康熙帝能理解天主教，尊敬天主教，至少對它表示相當尊敬的態度，特別是從他對皇太子勸導他信奉天主教一點可以看出來，所以白進和張誠兩師及在朝的耶穌會士，都非常慶幸，相信「異教的天子，不遠離天國。」尤其是因為康熙帝愛護學問藝術，把這位中國皇帝看做遠東的路易十四，東西兩大英主唯一不同的地方，只是康熙帝還沒有接受天主教的洗禮罷了。所以他們向中國皇帝進講天主教的教理，企圖用全份力量達到使皇帝改宗這個目的。不過康熙帝自己却一直沒有發表改宗的意思。(Le Comte, Nouveaux memoires sur l'etat present de la Chine, t. I, p. 12 Bouvet, Histoir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pp. 153-154)

一六九一年(康熙三十年)九月，浙江省巡撫張鵬翻認天主教為「邪教」，對居住該省的傳教師和中國信徒，橫加壓迫。偶然有一個住在杭州府臨安地方的天主教徒，因為信仰上的事，和父母發生爭論，父親突然向官府控告，要求對他的孩子教訓一頓。官府立刻把「近親不和」「煽動叛逆」為「邪教之罪」。巡撫就發表對天主教的論難書，勸告基督教徒叛信國教。他又下令封閉幾所教會，在門上高貼邪教論難書。官府方面當即有人侵入教會內部搗亂，污辱聖像、推倒十字架、撕毀聖經。並在各地捉拿天主教徒，關進牢獄，橫加管刑，但是天主教徒都閉目忍受，在苦難中高歌天父的聖名。

有一個醫生訪問信徒之家，安慰沉在憂悶之淵的人們。原來這個醫生也是天主教徒，這一行動給官府知道了，立刻把他加上腳鐐手銬一拖進衙門，大肆杖刑。當時有一個受此醫生勸導而受洗禮的青年，衝入皂隸夥內，在官吏面前，兩眼流淚，要求代替醫生受刑罰。醫生憤然拒絕了這個要求

，自願追隨基督戴「荆棘之冠」而殉教，兩人之間，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在座的判官為之吃驚，傍觀者也莫不感動。結果這個醫生被用粗棍打得血肉模糊，醫生的雙親聞訊趕到，要把自己的兒子帶回家去，但是醫生不聽，願意進殿特爾契泰大師的教會裏去（這個教會尚未被封）。他由信徒簇擁，血淋漓地站不起來，他反復聲言：我的最後一滴血，也要為天父而流，以維護聖教。不願這樣壓迫的慘酷，而信心愈益堅定，反使傍觀者為之心動，有許多人願意立即受洗。

住在北京的耶穌會士從特爾契泰大師那裏得到關於浙江省教友被迫害的消息，他們認為這種壓迫一時不易鎮靜，用盡心思，以謀對策。結果不得不把這種被迫害的狀況，向康熙帝奏明。不過，這種壓迫之所以發生，自有康熙八年的禁令為其護符。那些頑固的儒家和僧道，就利用這個禁令，為排斥邪教而煽動官府。所以，如果不撤廢這個禁令，則無法永遠避免對基督教的壓迫。所以決定向皇帝懇求，允許天主教傳道。

起初，康熙帝駁斥了他們這種請求。但是看到他們悲痛的情形，終於允許上疏。在朝的教徒因此愁眉漸展，以漢文上疏二通，請皇帝定奪。這兩個疏文裏，都沒有涉及杭州事件，專門陳述基督教的純真，指出中國允許各教公開活動，而獨禁止基督教，實有失於公平。如對基督教有所懷疑，主張當場辯明。（Le Gobien, Histoire de l'Edit l'Empereur de la Chine, pp. 117-118 Paris, 1702）康熙帝認為這疏文的內容，畢竟還不足以反駁禮部所屬漢族官吏的摺衷說，他就親自執筆作成疏文。這個疏文的內容，是首先述及康熙帝巡幸南方諸省之時會御賜傳教使拜謁及優禮，而巡撫則反對傳教師橫加壓迫，指出其間之矛盾。然後列舉在朝西方教徒歷代獻替的事蹟，如湯若望之製造兵器、南懷仁在天文學上之貢獻，徐日昇（Pereira）張誠二位大師在納爾丁斯克條約中的功績等等，而對於基督教的真理和純正，却一字不提（Le Gobien, Histoire de l'Edit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pp. 118-137—Le Comte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esent de la Chine, t. II, pp. 333-340, Paris, 1902）他命令當時欽天監監正徐日昇和托麥爾氏在朝見之時，把這疏文向皇帝提出，這天康熙帝不動聲色，和其他的表章一樣，接受了傳教師的上疏，下令禮部檢讀其內容，諭示必須迅速回奏，並勸諭禮部對傳教師應表示好意。然而禮部方面因為康熙八年的禁令，又因該部對天主教的態度，早有決定，所以在奏覆之時，擬請不許天主教公開活動。康熙帝對於這個復奏頗表不滿，下諭再行考慮到傳教師的志願。然而禮部依然用禁令做盾牌，不提出同樣的復旨，禮部只允許特爾契泰氏滯留於浙江省，承認歐洲人信仰天主教及在教會內舉行儀式，而嚴禁中國人皈依天主教，違重舊令的意旨。

## 五 康熙帝與天主教解禁

中國皇帝是履行「天意」的絕對的君主。但是這種絕對權力，如果沒有獲得禮部的承認，也會不發生效力的。所以「天子」的權力，事實上也有所限制。這也可說是中國政體上的一種奧妙。當時就因為這種奧妙，完全束縛了康熙帝的意志。他想到西歐教士的貢獻和忠誠，深表同情，特派專員向他們慰問，然而他們的懊惱和絕望，決不是空話和安慰所能緩和的。有一個傳教師回憶當時的悲哀，會利用中國的成語來形容說：「如喪考妣」。

康熙帝知道宮內大臣索額圖和耶穌會士友交親密，欲和這位閣老計議打開僵局。索額圖是康熙帝的近親，是最有實力的閣僚。康熙二十七年納爾丁斯克條約締結之時為首席全權代表，和俄國的全權代表折衝，幸獲當時隨從通譯張誠和徐日昇的努力，才得收獲樽俎之功，所以他立誓他日當為天主教努力。及接浙江省壓迫天主教事件的情報，索額圖就再度致書巡撫張鵬翮，論述壓迫政策與帝意抵觸，促其反省。現在這個閣老接到皇帝的召見，他立刻進宮。康熙帝向他述及禮部的頑固情形，並表明對天主教同情，請籌機宜處置之法。索額圖研究天主教的教理，倫理觀念及格言，認為他的內容和天下之正理及天理天法，毫無抵觸之處。要而言之，天主教教理的內容，只是和平、仁愛及服從的觀念而已。所以排擊天主教者，完全由於不知道天主教內容之故。如果中國國民皈依了天主教而信奉此異教，也許亂臣賊子就可以立即絕跡，因此可以省去許多軍旅和警吏。而且徵之史實，自康熙帝即位以來，已經過了三十多年，對於散處各省的傳教師及中國人天主教徒，政府也從來沒有聽到什麼不良言行。而且索額圖氏以閣老要職而參與政治的權機也十年了，對於傳教師和信徒，也從來沒有聽到什麼不平之聲。這些事實又可以證明傳教師和新教徒，都沒有什麼非法的陰謀。

中國政府允許國內人民信奉喇嘛教、佛教、回教、道教、並許他們在國內建設寺院。而其間不少在宗教的內容上虛誕無稽的，也是衆人所知的。然而天主教的教理純正，傳教師及信徒的行動也很靜謐。而中國政府對別的教派允許信仰自由，獨對天主教則加以禁止，不能不說是政府本身一大矛盾。這可說是中國政府蹂躪「天下之至理」，犯了重大的非法行為。天主教的學術使節，以天文曆數而有所貢獻於中國，已為衆所共認，特別是南懷仁在吳三桂率兵叛亂之時，完成了鑄造大砲的重任，挽救清朝危機。又當納爾丁斯克條約之時，張誠徐日昇兩位以通譯而奔走折衝於樽俎之間，締結了於中國有利的條約。所以嚴禁信奉天主教，而督促他們返國，實屬有關國家利害的。

索額圖這樣提出正大光明的正論，批評康熙帝之優柔不斷的態度，勸告迅速對禮部運用高壓權。

康熙帝承認索額圖氏的正論，同時也承認自己的怯懦。皇帝就用自己的名號，召集禮部會議。索額圖立即列席禮部的會議，力陳天主教的擁護論。這論旨，大體上和上面所引他對康熙帝的奏文相符。他的正理和辯論漸使滿洲出身的官吏動了心，終於顛覆了最頑固的漢族官吏的攘夷的觀念。禮部也承認索額圖之說，起草天主教解禁的奏表，奉呈給康熙帝。當然皇帝嘉納這個奏表，到了一六九二年（康熙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國正式承認天主教的信仰自由了。

耶穌會士開始達到了多年來的宿望，其如何歡喜，當可想像。他們把天主教獲得公開發展的准許的真實原因，歸功於他們在科學方面的造詣。「我們未到中國來以前，已曾研究科學而至熟練。康熙帝之決定勅許基督教，其真因即在乎此種科學。這也是神所賜予的恩典。」（Lettre du P. Fontaney au P. de la Chaine, Lettres edificantes et curieuses, t. VII, pp. 203—204）。

隨侍在康熙帝旁邊的教士舉行奏開天主教解禁的御禮。康熙帝當時嚴戒留居各省的傳教師濫用這個新命令而增加地方官和中央政府之間的困難。教士們考慮到這個勅旨，更認真康熙帝自動的把天主教解禁和因為厚愛傳教師而犧牲自己政見的難得。

第二年，康熙帝病了。張誠和徐日昇兩位大師奉勅命值宿宮內兩師就奏述路易十四分給國內貧民以藥品一事，他們把這種藥進獻了。康熙帝服此藥後，一日就恢復健康。不過因為不知保攝，以致再度發生高熱。他患的是瘧疾。官中充滿了憂愁。政府在府內揭示，徵求對於這種病的特效藥品，命令有這種靈藥的自行舉報。當有一個和尚呈獻出來，仰天祈禱之後，進獻了一盃清水，當然，這是不會有什麼靈效的，張誠和白進二師就把洪若翰氏所說的奎寧取出，把這種西藥呈獻給康熙帝，服後居然高熱盡退，不久全愈。官中立刻喜氣洋溢。康熙帝就召集大官，爲了嘉獎兩位大師的功績，提出建立教會之議。當即取出皇城地圖，從聳立在西安門內的大廈之中，選擇最便於作爲會堂的地方。這一所會堂，就是以前太傅（皇儲傳育官）所住的，因獲罪而沒收的，工部方面接奉勅命，即着手修復，並在會堂之外，另行興建傳教師的住宅。皇帝御賜每一個傳教師紋銀五十兩，另加在教會建築費內。並賜給官室所用木材，命廷臣專司其事。由當初和白進氏同來中國的意大利畫家季拉提尼（Cio Ghirardini）爲新堂的裝飾而發揮其入神的妙技。四年之後，這個教會的建設完全竣功了。這一所天主教會，要算是遠東第一所壯麗的會堂了。

## 六 東西兩位大帝的野心與興趣

上述的事實，是當時侍奉於康熙帝左右的法國宗教使節寫給教會長老及當局大員的書信的內容。這種書信是奉路易十四之使命，研究中國文物制度並報告自己成績的紀要。當時奉使中國的耶穌會士，是從多數候選者中嚴格選擇出來的高僧名士，他們對於自己的君主和長老，當然不能輕破妄語之戒的，不過他們過着所謂聖教中心的生活，觀察判斷有失正當之處，當然也在所不免。所以對於上面所描述的事略，我們還有得採取相當保留的態度之必要。

明末以後遠來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師，不管中國自古以來的攘夷觀如何深入人心，他們還是做了朝廷的貴賓，或者漫行各省，當然，最主要的是靠了他們帶來的西歐科學文化的偉大力量。當然，其間也難免具有政治上的作用的，例如路易十四派遣本國耶穌會士到暹羅，由這些傳教師的居介，籠絡了暹羅的宰相、和希臘人康斯丹士·波爾康（Constance Phaulkon），首先是兩國交換使節，接着締結修好條約，最後竟無形中淪暹羅爲法國的保護國。然而暹羅的國權憤憤起，暗殺了康斯丹士，使路易大帝的野心化爲泡影。由此事推斷，路易十四之派遣耶穌會士到中國來，難免也負有爲完成法國之遠東政策即路易大帝之帝國主義政策的使命。當時法國宰相柯爾班爾對中國傳道團長洪若翰氏，希望其傳道告成和學藝上的成功，俾爲國家增榮。他說：「諸師爲研究學問，實無缺別故里，跨越萬里之波濤而托足於遠東天地之必要。然爲使異教徒改宗，以信者之魂靈捧獻於基督，則諸師此行之意義，誠大矣哉！予深望師尊利用此機會，於宣傳福音之餘暇，就地爲法國學藝上之完成而作必要之各種研究。」（Lettre du P. de Fontaney au P. de la Chaine, Lettres edificantes Curieuses, t. VII, p. 119）

派遣到中國來的耶穌會士是否理解及實行政府當局的意旨，姑置不論，但是耶穌會派宗教上的版圖擴張主義和路易十四世之政治的版圖擴張政策，自成一體的事實，却是不可否認的。所以也有人把被派遣到遠東來的耶穌會士看做觀視他人國家的間諜的，就在歐洲，例如著名的伏爾台氏所著「警告東洋民族」（Avis a tous les Orientaux），認耶穌會士爲軍事偵探。伏爾台氏是反基督教的名士，對於他的言論，當然不能無批判地接受，但是至少也可以代表一部分輿論，而當時法國耶穌會士之被路易十四利用，或亦爲事實。不過在耶穌會士自身則確以科學知識爲其傳道的工具，因而介紹了近代科學入中國。

例如上述，康熙帝命令作爲科學家的法國耶穌會士在朝伴君，決不是



爲要他們在身邊宣傳天主教。康熙帝的研究心，在儘可能從他們的頭腦中神取科學的知識。他們帶來的法國的科學文明，是世界新知識，爲遠東的「天子」所驚嘆。康熙帝就是爲此而認識西歐文化的真價值，拋棄了過去「中華文化」的絕對的自傲。

康熙帝認爲天文學和曆學，在中國自古以來的重農政策上，非常需要。數學亦是對於天文學之發展，所不可或缺。但是從康熙帝跟法國耶穌會士研究數學的態度來說，這位皇帝，單純只是爲着趣味而研究數學。和中國人自古以文學即詩文作爲文字的遊戲來玩弄相同，康熙帝實在不過把數學作爲一種知識的遊戲而已。到了康熙帝跟巴多明大師學習解剖學的時候，認爲這種學問，爲醫學的基礎，是對於人類的生命和保全健康上必要的知識。因此想到解剖罪犯的屍體，以爲其侵害社會利益的報償。但是當這部譯書完成的時候，他又只把滿漢兩種文字的譯稿，秘藏在行宮的文庫裏，絕對不許公開印行。這又可以看出這個皇帝的思想和行動的矛盾。這個皇帝始終被中國古代的道德觀念所束縛，並不真正了解新興科學的真價值。所以就以巴多明大師翻譯的解剖書來說，也只是爲了滿足這位皇帝對科學的興趣即科學的享樂主義，對於社會福利却並未發揮其真價值。然而在當時的歐洲，科學已有長足的進步，知識階級不是已經都了解科學的真價值呢？不幸我的答覆也是否定的，路易王朝的貴公子貴婦人們，和他們閒來賦些歪詩，沉湎於言詞的遊戲一樣，偶然也研究天文學和數學，特別是富貴的婦人們，和貴族的惡劣趣味一樣，在屋上放置着望遠鏡，窺望天空作耍，完全忘記了家務和社會的現實問題。一讀莫利哀氏的喜劇，特別是其中的名著「女學者」(Les Femmes savantes, 1672) 就可以活活地看出這種情形。實際上，當時的有閒階級，他們之「研究」科學知識，正和「研究」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學一樣，作爲哲學趣味的源泉，是一種時髦風氣罷了。從這一點來看，東西兩洋的知識階級對於科學，原來都會曲解其真正的價值。所以當時西歐的無神論者，爲了抨擊基督教理論和推翻神學而利用科學思想特別是天文學的知識。如勃爾(Bayle)的「慧星雜感」(Pensees diverses sur la comete, 1682) 及洪若翰的「天文學講話」(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e des mondes, 686)，是其有力的例證。只有耶穌會士爲了傳道而利用敵方的武器——天文學及數學的知識

，值得特別重視罷了。

據法國耶穌會士的說法，康熙帝跟他們研究基督教的教理，承認其教理符合自然的法則，因此認爲和中國哲學一致。不過他們的記述都很簡單，不知充分了解當時康熙帝在那一點上認爲儒教和基督教思想一致。大體上說，耶穌會士帶給中國的基督教，天主教，是相當富有妥協性的，這是從「禮儀問題」中可以看到。儒教可說是一種德教，所以基督教在倫理道德一點上考察起來，東西兩教在這一點上是互相類似的。當侍奉君側的耶穌會士懇請承認天主教爲合法教派之時，康熙帝答稱：「卿等尚未入天國，然卿等無時不爲天國之事而憂慮。此在現世，殆不足以置信。此亦復爲可笑之言耳。幸信朕言，任何物品，均有可用之時也。上帝賜予之物，非善爲利用不可。卿等之顧慮，唯對死者感謝。蓋此種關注，爲死後計也。朕於現世之事，殆無掛慮，故亦雅不願裁斷此種熱中之呈訴。」(Le Comte, Nouveaux memoires sur l'etat present de la Chine, t. II, p. 28)。

康熙帝其實是極端的現世主義者，可說是經驗的唯物論者，所以侍奉君側的西方教士無論如何陳說天主教之教理，對於康熙帝，正可說是「對牛彈琴」。不過那班傳教師，聽到了康熙帝這種說法，還不了解這位皇帝絕無向教之心，他們一向感受皇帝的優越待遇，又接到公開准許異教傳道的恩旨，自然只知道感謝了，其實這是何等迂腐的事！康熙帝的上諭中就曾這樣警告：「讚美天主，西教亦與國教不能相容。但因西教之使徒，通曉科學，故國家不惜擢用彼輩耳。國人對此，不可不察焉。」(Piny譯E. Cordier, Histoire generale dala Chine, t. III, p. 328 中引用)。

## 七 路易大帝的失敗和康熙帝的成功

總之，康熙帝並不信有天國存在，所以他決不改宗皈依天主教。所以他的論准天主教解禁，毫無宗教上的意義。這個「唯物論」者只是喜歡耶穌會士對國家的貢獻和忠誠，如果繼續禁止天主教，則將來勢必趕走這批客卿，爲着吸收外來的文明要素，認爲有使異教的傳教師留在中國的必要。而且既已允許佛、喇嘛教、回教的信教自由，如不許天主教公開，道在理上也說不過去。何況由於天主教的禁令，已經激起有如浙江省所發

生的教案呢？所以康熙帝之諭准天主教解禁，完全是政治的。在耶穌會士方面，除了那些「自我陶醉」及「自欺欺人」之流之外，如上述的中國傳道團團長洪若翰氏，也只說天主教解禁的真實原因，歸功於他們的科學上的造詣。當時有一位航海到廈門的旅行家也說到這一點：「康熙帝知道歐洲固有的科學和藝術，想要學習。所以允許傳教師留居中國，傳佈異教。但是這位皇帝絲毫沒有信奉基督教的意思。」（Le Gentil, La Barbinais) *Nouveau voyage, autour du monde*, t. I. p. 436 Paris, 723)。

路易十四世會絕對禁止信奉新教，不允許信仰自由。然而却遣派中國人視為異教的耶穌會士到中國，要求中國政府允許信仰自由。這正是「己所不欲」，而「強施於人」。路易十四世，廢除亨利四世公佈的「拿恩特勅令」，新教徒決不許改宗舊教。他們陸續流亡到英德等國。結果敵國的產業突形發達，法國的產業頓形衰退。但是，康熙帝承認信仰自由，允許天主教公開傳道，因此耶穌會士越發仰慕德澤，願盡忠誠，一七〇八年（康熙四十七年）以來，奉勅命而着手繪製中國全圖，實測各省地形，在十多年之後，終於測成朝鮮西藏地圖。這樣，恰使自由主義的餘功和專制主義的餘弊，在同一時期，形成東西兩方的對照。

初期的傳教師，視中國為野蠻國家，以對偶像教徒宣傳福音伸其覺悟而遠來中國。然而中國畢竟是四千餘年的文明國，其文物制度遠比西歐完備，特別是在康熙帝時代，是中國文化的黃金期。所以當這些傳教師進一步研究了中國文化之後，反而成為中國文明即「異端文化」的禮讚者了。而且，他們受到康熙帝優渥的待遇，更成為異教君主的讚美者，喧傳其風格了。「這位皇帝的精神上的美質，遠較肉體的美質為優。他生來具有世界最善的素質。他有俊敏的才智，卓越的記憶力，可驚的廣泛的才能，忍耐得任一切事件的試鍊，而且有大計劃，有統率之力，有完成此項計劃的意志和能力。這種性情都是高尚的，最適於為君主。而在國務執掌之間，尚富於藝術趣味，對凡百學問，兢兢自勉，使我們不禁為之驚嘆。」（Bouvet, *Histoire de la Chine*, pp. 11-12）。

因此，「康熙皇帝這個名字被當作學問的熱愛者，以及外來文明研究者而震響了歐洲。」（“Ce grand prince digne de tous nos regrets, ne fut pas seulement pour les peuples de l'Asie un objet d'admini-

ration; son merite extraordinaire et la gloire de son regne ont penetre au-dela de ces vastes mers qui nous separent des on Empire, et lui ont attire l'attention et l'estime de toute l'Europe.” *Lettres edificantes et curieuses*, t. XVII. Preface, p. 28 Paris, 1718)

耶穌會派傳教師成為中國文化和中國皇帝的密友，不僅推翻了路易十四的遠東政策，而且也和基督教派內的原意背道而馳了。繼續耶穌會派而來中國傳教的佛蘭西斯教團和多米尼古教團兩派的傳教師，嫉嫉耶穌會派在中國的成功，把上述耶穌會派之「宗教的罪過」以為奇貨，訴諸羅馬的教皇政府，從羅馬開始，在各地引起所謂「禮儀問題」。

一七〇四年（康熙四十三年）羅馬教皇特使，鐸羅（Tournon）長老把中國禮儀的禁令帶到了北京。康熙帝開始賜給這個使節以優待，但是一知這個使節是為戒飭耶穌會士而來，康熙帝的態度立刻轉變了。特別是當福建省的傳教師邁格羅（Le P. Maigrot）在皇帝面前非議孔子的教義之時，皇帝大怒，下令把這個傳教師驅逐出門。但也可以看到所謂「禮儀問題」這種歐洲方面的宗教爭議，已經蔓延到了北京皇帝身邊了。康熙帝眼看這種宗派之爭的醜態，想到這些「應受和平」的聖職者忘却了教祖的教義，到了遠東還祇知派系之爭而忘記宣傳福音的本務，從此對於天主教及其傳教者，都漸漸失去尊敬和好感。（Voltaire, *Sur les disputes des Reverends Peres Jesuites a la Chine.* (*Lettres Chinoises*) lettre VI H. Cordier, *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e*, t. III, p. 338)。

路易十四所派出的耶穌會士，受到康熙帝的懷柔，變成中國皇帝的讚美者，特別是中國文化的禮讚者，路易大帝對清朝的政治上的野心終於毫無收穫。加以後來因為禮儀問題，傳教師都熱中於神學的爭論，表現宗派之爭的醜態，否定了基督教本身的價值，使在中國的傳道事業亦沒有什麼成功。然而耶穌會士介紹給祖國的中國政治思想即德治主義，却為當時的革新哲學者——特別是為伏爾台爾氏所利用，作為攻擊基督教和專制政治論的材料，造成了路易王朝專制政權沒落的因素。因此，我們可以說：康熙帝之籠絡法國耶穌會士，吸取西歐科學文化，不僅排除了路易十四對遠東的帝國主義的野心，而且間接使成為推翻法國專制政府的理論因素之一；雖然在中國，封建的專制政權是更加鞏固了。

林東陳

# 散 \* 步 \* 的 \* 藝 \* 術

我們是絕頂聰明的人類，對於設計汽車，佈置會場，以及其他精巧的手藝，都非常熟練。可是不幸，因為過分專心於這些技能，我們竟把更古老而更基本的學問完全忘了。

散步本來是一種藝術，它是含有微妙之精神價值的一種動作。這藝術今日已幾乎絕跡，未免太可惜了。

第一，散步者絕不可有一種目的。倘使你抱定目的，預備到永安公司去，或是到表弟的家裏去，這目的將不斷地煩擾你的下意識。它將刺激你的感覺和你的心靈。因此，你最好不要有什麼目的。就是乾脆為散步而出去散步。

第二，散步不該是預定的計畫，好比像出席會議，或是向銀行申請貸款。它必須像突然的微笑那麼自然。有這麼一天，當你靜靜地讀着書或做着家事的時候，你會突然不明其所以然地想起要出去散步。那麼你就該馬上實行。把門打開，走出門外。

第三個條件最關重要，同時却是最困難的。你必須從你的頭腦中抹去一切平日的煩惱和苦痛。你倘使不能辦到這一點的話，散步非但無益，並且是有害的。假如你出去散步，內心充滿着煩惱，例如關於到期的債款，那麼你的雙腿有旋律的動作，將好像歌曲的疊句一般，在你的耳中鳴響：「你的債款到期了，你的債款到期了，你的債款到期了！」過去當你聽着火車輪的轉響，或是時鳴鐘之的塔聲，你一定有過這樣的經驗。倘使你出去散步，腦中裝滿着苦痛的煩惱，等到你回家來的時候，這煩惱將更形根深蒂固。因此，當你踏出散步的第一步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必须像蛇蛻皮一樣，把你日常的心事堅決地丟開。實際上，這也並不是怎樣困難的事。你只要這樣地對自已說：「讓我在今後的幾分鐘間，暫時脫離這世界，踏入另一個靈魂的世界。當然，不久我又須回到這世界來，不過在這幾分鐘中我將逃避到另一個幻覺的世界。」

在你走路的時候，既不要走得快，也不要走得太慢，使你血液的循環停滯不動。你的步伐該是正常、溫和而自由擺動的。最好陷於一種旋律之中。現代生活老為動搖不定和缺乏均衡所苦。

步伐有旋律的散步可以解除人體筋肉的束縛，解放平日心胸的鬱抑。另一個很重要的規則是，在你散步的時候，不要把你的注意轉向「人」。在我們像沙汀魚一般擁塞的現代生活中，我們因為過分密切地接近同胞們，使我們天天過着悽慘的生活。忘掉人們，抹煞他們，把他們完全從你的知覺中除去，猶如你負債等等得一乾二淨一般。相反地，你必须張開你的眼睛，看看你平日無暇觀看的奇異的事物。倘使是夏天的話，那麼就看看樹葉，如是在冬天的，則欣賞一下葉落枝枯的樹。看看雨後水瀉裏的映像；望望天空之積雲和卷雲的種種形狀；使你的知覺意識到細微的觸覺，知覺到草、沙或石子碰到腳底時的感觸。

一天二十四小時，你的耳朵差不多是天天閉着。在車輛的轉響聲，打字機和電話的煩囂之中，你們為自衛起見，已經把耳朵裝聾了。所以你現在該把耳朵張開來。讓它們細細地聽聽潛伏在我們文化的吼聲之下的細微的聲音——枯葉在風中疾馳而過的瑟瑟聲，和燕子的細微的歌聲。任何一個都市中，總不至於於天空完全遮沒，沒有一片綠草生長，也沒有大地的氣息隨風漂流而來。你該注意這些東西！在都市的當中，你也可以看到小鳥在樹枝上轉響歌鳴；讓你的鼻孔吸收湖水或河水所發出的水的氣息；沈思一下蒲公英從鋪石之間茁生的模樣。默默地觀看夕陽的影子，體味着冷風吹上皮膚的感觸。

這世界並不是一個怎樣不堪居住的地方，倘使我們有機會能夠看看它，聞到它的氣味，觸到它的肌理，孤獨地和它相處。散步的目的就是熟悉這世界——重新喚醒你在孩提時代所感到的不可思議的快樂和驚異。仔細地觀看自然界的種種現象——暫時離開這煩囂的世間，體味一下超世俗的現實——這才是散步藝術的真諦。

## 編 後 編 者

目前，對於大學教育問題，各方面討論得十分熱鬧。報紙上，雜誌上，時常見到這一類文章。杜佐周博士的遺著「理想的大學與理想的大學生」，對此問題，提供了極為具體而有價值的意見，可以給大家參攷。

檀仁梅博士的「論目前學術研究的危機」一文，是一篇緊急的呼籲，對目前學術研究的荒涼寂寞，指陳其原因所在，且進一步提供了糾正這一病態的辦法。

本期特別要向讀者推荐的，是唐慶增先生的文章「記宋陳敷之農書」。唐先生是有名的經濟學者，他在中國經濟思想史方面的研究，達到了最好的造詣。本文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寶貴資料。同時因為這是一篇典範的讀書筆記，鉤元提要，去蕪存菁，青年讀者們自己寫讀書筆記時，好拿來作參考，所以編入讀書指導欄內。

散步的藝術，是一篇輕鬆的散文。

這裏應該補敘一筆的，是楊衛玉潘公昭兩先生合著的「康熙帝與西洋文化」一文，材料豐富而珍貴，搜輯排比之力下得很勤的。在上期已開始刊載了，但因篇幅關係，沒有加以介紹，很抱歉！

# 純·粹·理·性·批·判

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著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1781)

劉燕谷

**傳略：**伊曼紐爾·康德，是近代哲學史上劃時代的大哲學家。一七二四年生於普魯士的哥尼斯堡，父親是一個馬具商。父親和母親，都是敬虔派的信徒，家庭生活，安定而和平。特別是他的母親，對於他的感化力極大，而他的「善種」，也在那時由他的母親播種下了。一七三二年，進了中學，對於拉丁文的學習，非常熱心。一七四〇年，進哥尼斯堡大學，在艱苦的生活當中，完成了中學大學畢業後，充任家庭教師，先後垂八年之久。一七五四年，返母校任講師之職，十五年間，勤勉從事，於一七七〇年，升任論理學及形而上學教授。其後，並曾兩度就大學校長之職。一七八七年，被舉為柏林皇家學士院會員。一七九〇年後，漸趨衰老，於一七九七年告休。至一八〇四年，無疾而終。康德的批判哲學，為人所熟知；它在哲學史上，獲有最大的榮譽。一般哲學史中，都是以他為劃分時期的標準，即「康德以前」或「康德以後」。他以洛克的經驗論及休謨的懷疑的實證論為前提，而調和了近代哲學史上所對立的理性論和經驗論。在認識論方面，他用主觀來做客觀的基礎。他又認為獨斷論及懷疑論的誤謬，起原於人知的盲從；於是檢討人知的性質，而建立了批判哲學。他的著作甚多，其中，最著名的是三本巨著，即純粹理性批判（一七八一年），實踐理性批判（一七八八年）及判斷力批判（一七九〇年）。

**概說：**本書是康德的第一部主要著作，以論述人類的認識能力為主題。他在本書中，首先說明了主觀的形式以後，接着便主張我們所能認識的世界或自然，畢竟須進入主觀的形式。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主觀，則所認識的世界，也隨之沒有。世界本身的正體，是一種怎樣的東西，不是我們的知識所能了解；不過我們所知道的，世界，即我們所經驗的而且生活於其中的現世，不外乎是我們自己所造的。這就是說：現世是依我們的知識而存在的。所謂我們所知道的，完全因為我們有了了解的能力。可是如果再進一步來說，這個被了解的事物，到底是不是完全了解？這樣一問，我們又非先來確定我們的認識能力不可。如果這一切不確定的話，而僅僅說已經知道，則這便是沒有根據的獨斷論。因此，我們必須先來研究認識能力的性質、界限及權限。而這就是本書所敘述的主題。關於本書的內容，簡單地

分為下列幾點來說明：

**經驗** 我們的經驗，由兩種要素組合而成：一種是基於認識批判能力的要素；另外一種是外部動作刺激此能力的要素。前者是由內部而來的，稱之為形式；後者是由外部而來的，稱之為材料。這種形式，和材料一樣，在任何經驗中，都是存在的；可是它是一種普遍的東西，如時間或空間。這是直覺的形式，在人類的一切經驗中，它都是在工作着的。縱令在各種經驗中，材料是如何地不同；或是時間或空間以何內容去充實，但是這個形式，決不會變化。因為這個形式，不是由外部而來的；它是在我們的主觀中先天所具有的。只要在自己沒有消失的限度內，時間或空間，也決不會成為沒有。至於在這種形式中，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直覺形式，悟性形式及理性觀念。直覺形式，是指時間或空間而言。時間是在內部經驗範圍中的知覺的形式；而空間則為

外部經驗範圍的一切直覺的形式。而一切經驗，都是以此兩者為前提；而其直覺形式，都是被動的。其次，所謂悟性形式，即由直覺形式所把握的各種材料，使其成為真實的經驗，然後再把握些由直覺所獲得的材料，予以統一和綜合，這就是悟性形式的作用。而關於此統一和綜合，康氏認為有十二種範疇。最後，是理性觀念由範疇所統一的直覺，並不能滿足我們的所謂經驗的認識。我們必須根據理性所給與的原理，再來對這經驗的認識下一番整理的工夫，而予以最後的統一，而這個原理，便是觀念。但是在這個觀念之中，還可分為內部經驗，外部經驗及絕對約制三種。內部經驗是精神；外部經驗是世界；絕對約制是神。達到這個理性觀念後，知識方才無條件地被綜合起來。以上的各種形式，先天的為我們所具有；換句話說，即我們具有上述的各種形式，是較經驗為先。我們的思維，並不是由經驗而生的。不過在我們使用先天的形式或原理時，此形式或原理的起源，縱然不是經驗的，但當在適用的時候，無論如何，決不能超越經驗的範圍。它只有和經驗相結合而被使用。所以我們的經驗，是由直覺形式和範疇的相互活動而生的，因而也是極其主觀的。所以這並不是本體，而僅僅是現象。而在現象後邊隱藏着的東西，康氏稱之為「物自體」(Ding an sich)。這個物自體到底是什麼東西，則非我們的認識能力所能知道；而且也沒有知道的必要。我們認為必要的，只是此現象而已！

**空間** 關於空間的觀念，康德以為空間不是由經驗所抽象化的經驗的概念；恰恰相反，一切



經驗的概念，毋寧是以空間為基本而宣告成立的。我們從各種的觀點，可以了解空間在事實上是先天的直覺。本來，空間的純粹直覺，是由對象所感覺的所謂主觀的感受性，也是在客觀的一切直覺之先而表現的。我們人類根據這一主觀的條件而獲得外部的直覺。如果離開了這個條件，則一切都等於零。任何事物，當其作為我們的對象而出現時，必須附加上空間。所以空間是經驗之可能的條件。但是空間是觀念的東西；它不是實在的性質，也不是形而上學的性質。不過所謂直覺，並不是對「物自體」的直覺，而只是一種表象的認識；所以空間也以現象的範圍為限。

時間 在康德的體系中，認為時間自身並不是獨立的存在；而且也沒有作為事物之客觀的規定之實在的性質。時間僅僅是一種所謂內部的形式，換言之，即一種主觀的條件。一切時間關係，都表現於外部的直覺之上，所以它就是直覺，同時，也是對一切現象的先天的形式的條件。我們把時間由一切現象的先天的條件，是因為時間本身，從直接來說，是內部現象的條件；而從間接來說，則又為外部現象的條件。可是如果我們從這裏去除了其感性或其表象能力，則這又要等於「零」。所以這不能不說是主觀的條件。但是反過來說，我們如果從表現於直覺之中的現象看來，那麼這又必然地是客觀的條件。不僅如此，我們從感性所感覺到的一切對象來說，沒有附有時間這一條件的對象，在經驗中是沒有的。所以時間又具有經驗的實在性。

以上所述的空間與時間的直覺形式，使各種綜合的認識，成為可能；這些形式，便作為構成

認識的原理而活動着。而所謂空間，給與了純粹幾何學以成立根基，而時間則為數學和算學的成立基礎。這種經驗的數學的認識，不待說，也是由純粹直覺的形式和經驗的直覺發生關係而成的。

感性 所謂感性，就是使直覺得以成立的一種能力。如果不和感性發生關係，則一切直覺，都不能成立。本來，凡是我們所思維的，不問其為直接的或間接的，一定要和感性有關係。當我們和對象相接觸時，內部即有一種獲得表象的能力，即被感受性；這一被感受性，就是所謂感性。而由於這一感性，我們才能得到對象。一切在我們自身以外的對象，因和我們所有的感官相接觸的結果，而產生了直覺。而當對象和我們的感官相接觸時，其給與表象能力的作用，就是所謂感覺。所以感覺是在對象與感性中間所成立的。因之，凡是由感性所產生的直覺，如果通過感覺而與對象發生關係，就叫做經驗的直覺。而所謂感覺內容，屬於經驗的直覺的範圍，自不待言。啟發感性的對象，是和經驗的直覺相應的。對象沒有何等規定時，就稱為現象。而在此現象之中，與感覺相應的，稱之為現象的材料。本來，感性這一東西，不是由現象的物所獲得的；而是由存在於現象內部之「物自體」所感覺的。所以經驗的直覺，無疑的，是由上述的感覺而成立的。沒有感性的形式，即沒用感受能力的作用，直覺決不能成立。從這一點來說，感性的能力是主動的，並不僅僅是被動的。

悟性 悟性本來是一種認識能力，而與感性相對立的。所以又稱之為非感性的能力。就其性質來說，是所謂「概念」的起因，完全以思惟自

身的自發性為其基礎。所以它是分析的，而並不是直覺的。思惟之自發的活動和認識形式的作用，完全根據這個悟性而成立的；所以對概念來說，它是極其重要的。正如感性和直覺有關一樣，悟性也和概念有關。但是概念是基於「機能」的一種事物。所謂機能，其意義不外乎行動的統一；因之，悟性的作用，也是行動統一的行動，即論理的機能之統一的作用。而所謂悟性的能力，亦不外乎思惟。所以在性質上，它必須是自發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來說，悟性的作用，是把由感性所給與的各種各樣的直覺事物，加以結合。這種結合，無疑地是一種綜合作用；所以悟性的機能，又表現於綜合作用之中。這裏，所謂綜合，就是把各種不同的多數表象，加以統一，而使其成為一種認識。這種綜合，又可分為純粹與經驗兩種。所謂純粹綜合，即先天的事物，對所獲得的表象加以綜合之謂。而由此綜合，又產生了純粹悟性概念。這個純粹悟性概念，稱之為範疇。

範疇 悟性的機能，從論理的見地來說，不外乎是思惟的能力。這裏所謂思惟能力，就是一般的判斷能力。這因為一切悟性的行動，都可納入於判斷這一概念之下。因之，悟性和判斷，實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所以只要把判斷之統一的機能明瞭了以後，悟性的機能，也同時可以明瞭。判斷的統一作用，在論理學上，被區分為十二種形式。我們即以此十二種形式所含的作用為標準，來尋求純粹悟性概念；這樣，便更產生出悟性形式的十二種範疇。而這十二種範疇，又是怎樣的東西呢？康氏以為這還是同判斷一樣，先區

# 山東政治學院底苦悶

本刊專校 李佐材  
通訊員

山東政治學院在皖北阜陽。她隱伏於阜陽的鄉村。在她的周圍，比較有名的城市，若界首（西北），若商邱（北），若蚌埠（東），最少有五百華里的距離，這造成了她不求聞達的環境。二三年來，她不為重慶人所知道，而到現在，「山東政治學院」一名對外人仍是陌生的。

她彷彿一個農村人家的孩子，一總是汚穢地生長於阜陽間。廿九年春間，她遷生於魯南山區，由於敵偽的摧殘，不得安居，她於卅三年遷到皖北來。在這裏，她仍然住着鄉村，但知有一個巨大的轉變；那就是她脫變或另一個人。她藉着戰爭氣氛中的小環境——阜陽，展開她生命史之新的一頁。

政治學院本是戰時組織。國家為收容青年，培植抗建幹部，於各淪陷區創辦此戰時學校。內設文法兩科及幹訓班三部門。然而，山東的政治學院，隨了政府的流亡阜陽，非但停止培植抗建幹部，更把法定的組織結構兒除，代以師範專科作內容。這整個的學校，分析來，是以一個戰時的戰時學院為外衣，內裏赤裸裸地包括着一個師範專科。在勝利以前，由於形式與內容的不符，曾予人以非福非馬之感。現在是勝利一年多了，一切復員了，誰都脫下那戰時的服裝，回到平時的衣冠。然而，山東政治學院還是停滯在戰時狀態，孤零零地留在皖北！

師範專科是三年制。法律上，她總算有高教地位，按師範生的使命，按高教的性質，她應該受到優渥的培植；不應與一年制之政治學院各科一般潦草。但實際上被重視的程度並未合標準，同儕來是一部痛苦史。因為她具備了高教之名——學院——為多少青年所憧憬！他們，有的拋棄偉大學的學籍；有的犧牲已有

應專業基礎；有的抱着嶄新的高中文憑，都懷着全副希望投進來。他們要求知識所驅使，希望在她底懷抱裏健全起來。然而，結果失望了。

戰爭是萬惡的。而假戰時之名以適其私者更是罪不可道。然而，山東政治學院底一批青年，却就在「戰時」二字之應用下，犧牲了青春，耗盡了前途，幻滅了！一切！戰時是缺乏人材的，非學者而提升為講師。戰時是談不到設備的，圖書儀器因之沒有。戰時是經濟拮据的，所以吃空名，揩油。戰時是有着無限的包涵性；而執事者底一切責任，都可卸卸而辭告。啊！只有學生階級是不堪戰時二字的包涵。但，實際上又無可奈何。這一切，只有用詛咒，忍耐，來寄望於未來！

然而，希望往往予人以相反的結果，山東政治學院自院長易人以來，是每况愈下。在教員方面，即產筆者亦不復備充數，空堂佈滿了課表，空堂予人以無限苦悶。但，一年來，學生却是在空堂中度了過來。苦悶之餘，為了要求上課，為了要求健全的先生，這其中有着數度波折。儘管苦衷是為求學，動機是多麼單純，但結果仍被冠以學潮的頭銜，用傳統的看法來估量學生。混飯吃的教員，更是趁機宣傳，掩飾其被驅逐之醜，政府方面更為體面關係，否認學校所有的缺陷，而歸咎於學生之不安分。到現在是一年了，政治學院在「官官相衛」的宣傳下，是烏煙瘴氣地在局外人底腦中存在着。她受着三重枷鎖之束縛：學校當局為掩飾其罪惡，對上蒙蔽，對外混淆；更利用無可奈何的局面，不死不活地拖延。這戰略是爭取時間，光顧着門領經費。只要靠山不動，誰也無可奈何的！外界人不明真相，取信於「官官」，不予學生諒解，而政府方面又是拘於情面及體面，粉飾太平，打着官腔，學生的呼籲實得其反。愈急於求人

分為四大別，即數量、性質、關係、及狀態四種。而這四大別中，又和判斷一樣，再可各分為三種。如第一種數量，可分為單一性、多數性及團體性；第二種性質，可分為實在性、否定性。及限制性；第三種關係，可分為偶然性與實體性，原因性與依賴性，以及相互性；第四種狀態，可分為可能性、現實性及必然性。屬於第一種及第二種範疇，與所謂直覺的對象有關，是數學的。屬於第三、第四範疇，與對象自身的存在有關，是力學的。這些範疇，都是使知識得以成立的先天的條件，我們在認識時，非根據此概念不可。而我們在獲得經驗的知識時的統一作用，常常要經過三種階段：第一是在直覺中的知覺的綜合；第二是在想像中的再現的綜合；第三是在概念中的認識的綜合。而由於這統一作用，經驗上的判斷，方才成為可能。

圖式論 所謂圖式論，便是要解明範疇如何才可適用到直覺上面去的問題。這裏，所謂範疇適用到直覺上面去，即是說。把直覺包括於範疇之下的意義。因為範疇本來是悟性的形式，範疇和直覺，完全是不同的東西。既然是兩種不同的東西，則在範疇不能發見直覺，毋寧是當然的事。但是不管怎樣，我們既然說範疇可以包括直覺，那麼這裏便非有何種可能關係存在不可。換言之，如果這個包括可以完成的話，則兩者之間，非有何種共通的東西存在不可。這種共通的東西，康氏稱為先驅的圖式。這種圖式，對於範疇和直覺，完全以第三者的姿態而出現。在一方面，它與範疇同其性質，而在另一方面，它又與直覺同其性質。而它又是感性的，所以也具有使範疇包括直覺的要求。這個第三者的先驅的圖式，其本質不外乎是先驅的時間規定。而圖式的作用，依照時間的內部形式，使一切表象，都遵從內部的規定。這就是概念的具體化，同時，也是直覺化。在此作用之下，範疇便被適用到直覺之上，同時，範疇自身也完全現實化了。

諒解，愈為狡黠者所藉口，一個致死的宣傳是：「政治學院底學生不簡單」！誰也未察山東政治學院是為僅有的幾個誤人子弟者所踐踏者，新任孫院長，半年來遲遲不說，及所有的態度，都表示自己不信自己的學生。而造成局面原因，是阜陽與濟南的距離，及山東駐阜辦事處的掩蔽醜聞，我們憎惡所有製造罪惡者。我們更恨小官僚為維持其飯盆，而抹煞事實，犧牲一批青年的前途。辦事處這位主任，只圖討個「能勝其任」，掩飾醜惡，粉飾太平，造成濟南與阜陽間底大隔閡，是值得提出來的！

山東政治學院學生底呼聲是無用的。他們被封鎖在偏僻的皖北，喊得再響沒有人聽見。為傳出這呼聲去，暑假前曾與衣實物湊費用，派代表赴京請願。結果是徒勞跋涉，在這種情形下，自身無錢無勢，更以環境閉塞，消息不為報人所探及，一切苦衷都不能向外宣揚。所謂「是」，所謂「真理」，是在官的一方面，一切操在別人手裏，所謂要求上課，所謂要求復員，都成幻想！

人們總是追求其一線希望的。雖然被遺棄，我們還希望別人知道：山東政治學院過去是沒有先生，空堂，鬼混；現在是不能開門。

留阜陽的山東各中等學校，雖然由於山東省政府間斷撥發所謂「維持費」使其無法維持，而造成種種不安，（如教職員兩度大罷教，學生風潮等），但尙可勉強開學。惟有山東政治學院在陰雲籠罩下，不能開學。原因是：一方面由於從來即缺乏先生；一方面由於新任孫院長有意地拋棄這一批青年，孫先生發表院長半年來，對留阜陽的山東政治學院置之不理，是一有力的證明。而今暑在濟南，他以山東政治學院的名義大量招生，另起爐灶，而把基本的山東政治學院當做「分院」，是另一有力的證據。

我們不願再呼喊，但不放棄希望。我們希望所有責任方面能親臨阜陽一行。用客觀的態度來廓清以往的陰

雲，使政治學院有個水落石出！

山東政治學院是山東惟一學府，在阜陽她度完了艱苦階段，整個抗戰勝利了，她雖然不必有勝利；但也不應死於非命，我們希望教育部能注意到這一學府的現狀，我們希望山東教育廳，能切實負責起辦高等教育之責任。我們更希望新任孫院長能親臨阜陽來解決這久懸的問題。教育廳李廳長，新任孫院長都是富於辦學經驗的青年導師，我們希望二公能面臨時事來解決問題，不要為片面詞所左右，盲目地拋棄一批青年。為造謠者中傷，而造成「未會面」的縫隙，於事情是慘痛的，於影響是不可思議的！

山東政治學院底學生，在這苦悶的壓力下，是極度不安的。為了明是非，為了求出路，他們無時不想逃出這環境。因為，在阜陽實在不能敷衍下去。現在，他們決計自動復員，簽名蓋章的復員組織，是未來冒險犯難的保證。這喊冤式，討飯式的掙扎會引起怎樣的後果，是不可預卜的。然而，在這無可奈何的事情未爆發前一刻，我們總希望有合理的方式，來解決積結的問題。因為，真的全部揭開，雖然可使社會明瞭山東政治學院的底幕，真相，但「於影響總是不可思議的」！百聞不如一見。我們唯一希望，是負責當局重視這山東最高學府的問題，親蒞視察，從教員的數量與素質上，從以定課程的進修上，從選讀的材料及進度上，甚至從發予學生講義的頁數上，來判別是非。這是最正當的辦法，舍此而弗由，無疑願意使事情惡化，擴大。這後果是不可思議的。

山東政治學院在惡意地宣傳下，為不明真相，不諒解的成見所支配，被遺棄於皖北。她可能被活活地困死，她以往的奮鬥史，將為新興的，在濟南的山東政治學院所掠取，一切不平之鳴失去效力；但不知未來不平之行動有何結果？然而，在求學期間，一切非常事情的發生，於學生是不幸的！但，他們却落在這不幸的深淵中，有一個可怕的陰影站在他們前面，使其徬徨，苦悶！

九月廿八日寄於阜陽

### 關 於 鄭 縣 扶 輪 中 學

扶輪學校是一種特別的學校，因為它是交通部立的（戰前是鐵道部立的），它只收容交通界員工的子女。

在戰前，扶輪中學只有兩所：天津扶輪中學和鄭縣扶輪中學。二十六年戰事爆發，天津淪陷，天津扶輪中解散；鄭縣扶輪中却經數度遷移，一直在維持着，中間一度成為全國唯一的扶輪中學。

這所學校成立迄今已有十六年了。原先設在鄭州，因為鄭州正是平漢鐵路和隴海鐵路的交會點，同時路局也在那裏，員工子弟大半集中在這裏讀書。因為經費充足，一切設備都很好，教師們都是國內有名的人，他們做事很認真，所以當時學校頗負盛譽。二十六年神聖抗戰起，學校先遷到陝西漢中，再遷襄城，於三十一年又遷到現在的所在，陝西蔡家坡來！在這裏不覺又過了四年！

### 王 任

現在全校共有學生十四班，初高中每一個年級都至少兩班，全校五十多位教職員，六百多個同學，在一塊生活，在一塊學習，該是怎樣的一種樂趣！

扶輪的課程向來被稱為嚴緊的，但是並不是讓同學讀死書啃課本，它是注重「活的教育」的。它有一個藏書數萬冊的圖書館和設備完善的理化生物儀器標本室。同學，由於學校鼓勵自由研究，於是整日讀書做實驗的不少。

扶輪一向主張自由和民主的，同學每個人都具有高度自治力，每班的班會組織很健全，校方有什麼大事也常和學生商討然後實行，對學生意見也很能採納。學生壁報出得很多；一切一切都表現出自由民主的精神來！扶輪中的膳食向來是由同學自己辦理的。有膳食自理委員會的組織，機構雖簡單，但仍能發揮最高工作效能

# 之江大學校長李培恩博士

## 一論研究商學的書

編輯室

佐周先生大鑒：

惠示詢及研究商學之善本，弟以今日學生，往往求其速成，然學問之道，欲速則不達，故就愚見所及，為今日商學學生所亟須切實下功夫者數點，介紹數齊：

(一) 英文——商學為應用科學，而今日之商業為世界性的。國際商業之語言為英語，故英文對商學之研究，為無可避免之知識。抗戰期間，因師資及其他原因，程度低落，亟應提高。近

來教部亦以提高英文閱讀能力為急務，而商學名著多係英文，故必先有英文基礎，始能研讀。

(二) 基本知識——對經濟原理及歷史，須有清楚認識。否則徒習皮毛，不足應付遠大，亦無由迎上時代。今日國內工商業之混亂狀態，亦九短見盲目所致，鄙見或為一般者認為迂闊，然既承下詢，敢貢區區。尚祈賜教為幸。此頌  
著祺！  
弟李培恩拜啟 十一月一日

附李博士介紹之商學書單如左：

書名	著譯者	出版者	篇幅及定價	出版時間	內容簡評	適用程度	備註
1. 三民主義英文讀本	李培恩	商務印書館	約十餘萬字	1925	近年來中學生英文程度甚差，以此自修或補習進步最速。與中文白話本對看亦可使高中文得長足進步。	高中二三年級及大學一年級	
2. 英文新約全書		聖教會會 價甚廉					
3.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	Alfred Marshall	Macmillan & Co. 1930	約十萬字		此書必須精讀，尤須細讀小註。	大學用	(一) 商學學生必須先有基本之經濟知識。 (二) 此書雖有譯本，但謬誤滋多，仍以讀原書為要。
4. The Economics of Alfred Marshall	H. I. Davenpor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35	約十萬字	1935	闡明前人經濟學之特點。	大學用	
5. A History of Olive Commerce	Oliver Day	Longman Green & Co.	約十萬字	1940	讀此書可得世界商業與革之大概知識。	大學或高中用	商學學生必須先明瞭歷史背景，才能了解現實，推測將來。

內證部登記證警字第七四八四號  
中華民國郵政總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這種組織法曾被某軍事學校採用，認爲非常科學化！同學們因爲南方人北方人都有，所以米麵混食，早餐是稀飯和一碗黃豆，中午是饅頭和三個菜，晚上是米飯三個菜，當然，吃得不好，可是在這個混亂的復興時期，這樣已經不錯了！

同學們喜歡課外各種活動，在有的方面某些同學具有特殊天才。像演劇，音樂會，賽球，演講，在這方面擅長的同学都勇於參加！至於壁報，每一班在每一學期都要出好幾期，一到共同出刊的日子，牆上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其他活動也常有的！

### 讀書通訊 半月刊

第一二二二期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兼志 盧于道

編輯委員 杜佐周 朱伯康

李季谷 邱竹師

發行人 劉百閱

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

發行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

電話 九一七〇五  
電報掛號 五二二三

每月十日、二十五日發行

預定請先惠法幣五千元

本期實價法幣六百元